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30期

【思想文化】

“红语”与“新话”——毛泽东时代的汉语词汇/方惜辰

【百年国史】

下乡知青流动与经济收入研究——以问卷调查为方法/乔晞华

绘本特殊年代——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一）/墨娃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1）

——错别字通行的新时代/李南央（美）

【序跋】

《黑与红——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

——楔子与后记/甄皓

【怀人】

王若水先生二三事/刘若

【述往】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吴忠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四）/杜钧福

【书讯】

甄皓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黑与红——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在美出版

【资料】

1.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 1967年1月2日的检查）

2. 揭发刘少奇（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诺 1967年1月6日在工体的讲话稿）

【补白】

黎澍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李锐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红语”与“新话”

——毛泽东时代的汉语词汇

方惜辰

一、“红语”的诞生

有红色文化就必有红色思想，有红色思想就必有红色语言（下称“红语”）。“红语”是由中共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对现代汉语在词汇、修辞和文体等方面进行了改造的一种新式汉语。它萌芽于四十年代，成长于五十年代，成熟于六十年代，大盛于文革十年，流毒并变异于后毛时代。成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至今在中国大陆普遍使用的汉语。

“红语”的词汇由政治、军事、粗口的泛化普及而成。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是思想的现实。“红语”的基本词或来自苏俄日本，或源于本土乡野。外来者以马列主义的理论词语构建，本土者以建党建军的之词语组成。这两种基本词，就仿佛是两条强大坚韧的树根，深扎于岩隙石缝之中。跟着革命，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虽曾低萎槁悴，生意几尽，但经井冈徙植，遵义移根。终获地利，得天时。于是花开延河之滨，实结炎黄大地。及至文革，赫赫然根节盘魄，主干崔嵬，枝叶葳蕤，山崖表里，华盖遮天，俨然古人所说的“商丘之木”。

革命能改天换地，却改不了语音与语法。“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三年零九个月，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消灭了三分之一人口，可是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志们还是得用高棉语。

人们通常把词汇称为语言。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语言跟着老爷夫人小姐一起流亡国外。平民语言、菜市大妈的语言，粗鲁粗野粗鄙的语言当家做了主人，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报刊和高高低低的话剧舞台。可是，“经过了当权的资产阶级清洗过的法国语言，仍然不可能恢复1789年以前的面目。革命在法国语言上烙下深深的印痕。”¹革命在语音、语法上施展不开手脚，但可以在词汇上大显神威。

¹ 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罗大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页73。

二、“红语”的发展壮大

中共建政，重整河山，一统思想，“红语”因势而起。胜利者刊发社论，要拯救语言于混乱之中，使之走上“纯洁而健康”的沧桑正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社论还告诉人们，毛与鲁的著作“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他们“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泽东为语言的使用制定了正确的原则，鲁迅则是“实现这些原则的模范”。²

这里所说的语言，指的就是词汇。“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不是说要创造一种新语法、新语音，而是说，要去旧迎新，迎接“红语”的普惠大众。

“红语”一般词是那“商丘之木”的枝叶，它们多由政治运动之词叠加积聚而成。如：土改、镇反、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胡风、评红楼梦、批胡适、工商业改造、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反右倾、三年困难、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学雷锋、学解放军、文艺整风……

经过多年的积蓄和培养，“红语”掌控了大量的基本词和一般词，有了称霸口头书面的资本。文革一来，“红语”精神大振，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勇气，招兵买马，狂征暴敛。大量枝叶性词汇，如：三家村黑店、红卫兵、造反派、资反路线、夺权、喷气式、文斗、武斗、砸烂狗头、油炸猪头、二月逆流、地派、天派、百万雄师、王关戚、小爬虫、新鲜血液、上山下乡、可教子女、大联合、三结合、三支两军、批林批孔、五七干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五一六、一斗二批三改……尽入彀中矣。

这些词语，每一个都标志着一段历史，每一个都记载着一场社会运动。每一个都丰富了党史，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卖萌主持人的拦路虎——某电视台主持采访某老，老人说到工商业改造，主持人一脸茫然。老人说到反右倾，主持人抖了一个机灵：啊，就是反右派运动吧？

²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老人请他走路。

语言的背后是风俗习惯，是思想文化，要让“红语”深入生活，洗涤头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十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到1966年，“红语”积攒了足够的能量，可以大干一场了。这一年的二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文件诞生。此文件有一个很长很啰唆的名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是毛亲自加上去的。文件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何止是新文艺！文化大革命破了旧文化，立了新文化。这个新文化首先就表现在“红语”对媒体的全面占领。

三、奥威尔的“新话”

看到“红语”，会想到“新话”。“新话”是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的一个情节。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³的压轴之作《1984》在深受西方主流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共产党阵营的围攻。《真理报》说此书“显示了奥威尔‘对人们的蔑视和诋毁性目的’，美国左刊《大众与主流》以《每日一蛆》为题，贬斥此书是“愤世嫉俗的胡扯八道……是对人类的诽谤”。《马克思主义者季刊》上则谴责奥威尔是“神经质的……对进步的一切都抱有令人压抑的仇恨”。总之，“猪罗”“蛆”“章鱼”“鬣狗”等骂名像苍蝇一样围着奥威尔，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⁴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中共正忙着建立红色中国，顾不上参加国际共运的“反奥威尔大合唱”。

³ 这三部曲指的是：苏联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884—1937）的《我们》，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1984》。

⁴ （美）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页308-309。

像前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一样，奥威尔也写到了极权国家的思想控制，奥威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以“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为抓手，将大洋国制作“新话”的过程，设计成一个贯彻全书的情节线。“真理部”高级研究员塞姆是拉动这个情节线的主要人物，从他那里，我们知道，这个被称为“英国社会主义”（English Socialism）简称“英社”：Ingsoc）的大洋国，正在“老大哥”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改造人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从1984年发动，计划在2050年结束。那时候，“新话”将最终代替旧话（标准英语），成为大洋国的官方语言。

这是一场远比“五七指示”更为深刻的社会与思想的大革命，“新话”提供的不仅是一种交际表达的工具，更为“英社”的信徒们“拥有与之思想相适应的世界观和思维习惯，而且要让其他任何思考模式变得不可能存在”奠定了基础。新话的目标是，“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且旧话被遗忘后，任何异端思想——即与‘英社’原则相悖的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

那么，“新话”是如何建构的呢？真理部有三个方案，一是消灭旧词，二是发明新词，三是对那些不得不保留下来的旧词的义项进行削减——“只要可能，将所有次一层的含义全部清除。”比如“free”有两个义项，一是“没有……的”，二是自由的。“新话”只保留前一个义项，所以，它只能用在“this dog is free lice”（这条狗身上不虱子），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田里不长野草）。而不能用在这个词的旧含义，即“politically free”（政治上自由）和“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上自由）。因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作为概念已不复存在。

上述三个方案，将使词汇总量减少再减少。“凡是并非一定用得到的词，都不允许存在。发明新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小它。将可供选择的词汇数量减到最少，能够间接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

“新话”的词汇分三类，A类是生活常用词，这类词的数量很少，定义则严格得多，所有含糊不清以及其他多层含义都一概清除。B类词汇“是为政治目的而有意创造出来，也就是说，这些词不仅每个都具有政治含义，而且创造这些词的目的，就是让使用这些词的人具有合乎需要的思想态度。”C类词汇是科技术语，这类词汇除了做了前两类同样的外科手术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没有能够表述把科学当作思维习惯或思想方法这方面功能的词汇。”

也就是说，科学这样的词，“它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都已完全被‘Ingsoc’所包含”。⁵

四、“红语”词汇的色彩与显隐

中国的“红语”与大洋国的“新话”不同。它不是小说家的预言，而是亿万群众的实践。在奥威尔的想象中，“新话跟几乎所有其他种类语言的区别之处，在于其词汇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不是增多”。但在数亿中国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中，“红语”词汇并不是单纯的数量增减，而是发生了一种微妙繁复的发展变化。刁宴斌先生在《“文革”时期语言研究》一书中，有三章专门研究词汇。他从词义、色彩、显隐和使用范围四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这里重点介绍色彩和显隐。

词汇的色彩义分六七种，刁先生主要讲感情色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褒义词和贬义词。“红语”善于把49年之前的褒义词贬义化，毛泽东是这方面的高手，“顽固派先生们”“国民党先生们”，随着这一声声嘲讽，“先生”俨然成了“反动派”的近亲。五十年代初的大中学生之所以还管老师叫先生，大概率是毛泽东做了榜样。⁶但是，作为对男性的尊称，这时候的“先生”已经危乎殆哉，及至“右派先生们”从伟大领袖口中一出，“先生”就即刻被推进了太平间，长久地冷冻起来。

据刁先生研究，这一类由褒而贬的词不少。比如称人一类的，如“天使、偶像、超人、大人物、大儒、干将、高参、君子、老手、权威、圣人、圣贤、贤人、孝子、救世主”等。

在上面这些词语中，干将、高参、老手、孝子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它们是“红语”的中坚。以干将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能干或敢干的人”。文革中，真正能干或敢干的红五类，尤其是老兵，可从来不称自己是干将。他们宁愿称自己兵——红卫兵或红小兵。同样能干且敢干的造反派头头也离干将远远的，而宁愿称自己勤务员。显然，干将不是自称，而是他人强加的，并且还一定是黑的。比如，彭罗陆杨是刘邓的“黑干将”，万里、崔月犁、吴晗、冯基平等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黑干将”，宋硕、彭珮云等市

⁵ 《1984》附录：《新话的原则》。

⁶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委下面的司局长又是这些“黑干将”的“黑干将”，以此类推，处级是司局级的“黑干将”，科级则是处级的“黑干将”。在激进左派看来，北京市委就是一个黑窝点。而按照正常人的标准，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市委人才荟萃，是一群“能干或敢干的人”的集合体。

叙事一类的词由褒入贬的也不少，刁先生举例：“锦标、功德、国粹、清福、天堂、义气、孝顺、清高、动听、时髦、甜蜜、安逸、慈悲、慈善”等。

“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有贬义化倾向，有一些则已经或基本上实现了贬义化。”

词汇的褒贬化是一个双向运动，由褒而贬的同时，由贬而褒也在加速度进行。造反、夺权、大老粗、泥腿子、穷棒子等贬义词，应运而变，成了人见人爱的褒义词。最有说服力的是“造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共产党“造反有理”。于是历代的下层造反者，都成了正义之士。挖掘、梳理农民起义资料，歌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成了时代主题。

再说说“词语的显现”。以我的理解，刁先生所说的显现，接近奥威尔所说的B类语言，即出于政治目的制造的“新话”。也就是汉语史学家陈建民所谓的“政治造词”，⁷戴昭明所谓的“新词”。⁸熟悉这些“新词”，是文革中人的必修课，就像当下的人们出门必须做核酸、戴口罩一样。

陈健民把这些词分成了三类：

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特有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如“红海洋、革委会、语录歌、忠字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牛棚”；

二是指称某种新的“政治身份”。如“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黑司令、黑五类、牛鬼蛇神、红司令、红五类、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工宣队”等；

三是当时常用的政治用语。如“红宝书、老三篇、黑会、黑电影、黑日记、横扫、触及灵魂、最高指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斗批改、上管改、文攻武卫”等。

⁷陈建民（1999：61）指出：“20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曾经有过三次‘大爆炸’：一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造词，大批外来词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进入了现代汉语。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造词，大批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词语接连出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带有全民性质的造词运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新词语。”

⁸戴昭明（1996：171-4）指出：在文革语言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又一批稀奇古怪的“文革词语”。在词汇学上，它们属于“新词”一类。

戴昭明概括了这些词语的五大特点：

- (1) 虚妄性，如“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
- (2) 幼稚的浮夸，如“红”族词中的“红卫兵、红宝书、红海洋”等；
- (3) 违背事理逻辑，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绝对权威”等；
- (4) 军事用语普泛化，如“教育战线、五七战士、炮打司令部”等；
- (5) 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谩骂性用语特别多，如“黑五类、狗崽子、小爬虫”等。

刁先生从词语构成的角度对这些词语进行分析，指出了这类新词的“三多”：

一是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如：“革命/革、红色/红、黑、大、派”等。他还举了很多例子。这类的例子我也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革命，彼时，好多词都加上了革命：革命群众、革命师生、革命行动、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的领导班子、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样板戏、革命……。革命泛滥到如此地步，说明原来的语言系统不灵了，以毛为首的中央上层乱了方寸，只好乞灵于革命这个词，把它当成镇妖驱邪、收拾天下的符咒。按社会语言学的说法，这叫“语言灵物崇拜”。

二是“数字构词”多。不用看刁先生举的那一大堆例子，凡是文革的亲历者都可以随口说出好几十：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个面向，五七道路、六厂二校、七二一大学、八三四一部队、九一三事件、十大关系、百万雄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数字构词非毛时代所独有，后毛时代也热衷于此：五讲四美三热爱、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四个坚持、四个自信、四个意识、四个应该、两个维护，一个核心……。应该说，数字构词是中共治国理政的方法之一，不过，要从产量上讲，在现代汉语的百年史上，唯以文革为多。

三是“军事构词”多。戴昭明提到了“军事用语普泛化”，讲的是词汇本身。刁先生深入一步：“以前人们较多关注文革期间军事词语大量泛化的问题，其实泛化不仅表现在词汇使用的层面，也表现在构词的层面，但是后者似乎被人们忽略了。”他举了一些例子：“百万雄师、保皇兵、保皇军、长征队、打翻身仗、打横炮、打派仗、打语录仗、反击右倾翻案风、副统帅、革命闯将、革命小将、黑干将、黑司令、红色司令部、红色外交战士、红司令、红

卫兵、红卫兵小将、红小兵、精神原子弹、揪刘火线、揪刘火线指挥部、刘邓司令部、派仗、三司、四大武器、文攻武卫指挥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七战士、资产阶级司令部等。”⁹

军事用语大量走进日常生活，与夺取政权的手段有关，与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地方有关，与执政党固守革命党的立场和传统有关，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心态，自从与苏联闹翻，中共就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机感灌输给了全社会，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国人将党中央臆想的战争当了真，青年人都盼着打仗。端赖军事语言构造的新词，才有了那些以反修防修自命的司令和司令部，才催生出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自命的战士和卫兵。

与词语的显现对应的是词语的潜隐。关于潜隐，刁先生有说明：“文革期间，有大批旧有词语趋于或已经退出使用，进入潜隐状态，其中有一些方面是相当独特的。”潜隐在这里，是个有分歧的概念。按甘祺庭的说法是“消亡”，按刁先生的说法是“退出使用，进入潜隐状态”。我的看法是，这两说都有理，也都有片面性。有的词确实死了，有的词就像股票一样，只是躲进小楼，窥测方向，图谋再起。它们也确实等来了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因此刁先生说，这些词经过了“有一无一有”的变化过程。

刁先生介绍了甘祺庭的研究，甘把“旧词语消亡”归纳为以下六种情况：

一是某些直接跟旧制度紧密联系的词语，如“总裁、保长、租界、洋行”；

二是指称不符合人民要求的行业和职业的词语，如“当铺、牙行、交际花、娼妓”；三是反映剥削阶级意识和职业歧视的词语，如“戏子、茶房、邮差、脚夫”；

四是反映旧的思想意识的词语，如“台甫、令爱、洋房、洋火”；

五是反映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称谓，如“满清、归绥（改为呼和浩特）”；

⁹刁先生所举，是否都是军事词语，值得商榷。比如“黑干将”。本文前面说过，干将指的是“能干或敢干的人”，不管他是黑的还是红的，都跟军事战争无关。我曾在《和平生活中的火药味——军事词语的泛化》一文中批评过邱明波，他把“旗帜”“红旗”“胜利”“前进”等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词汇，也塞进了军事词语之中。用这种窄化语义的办法来证明军事词语的泛化显然是不可取的。

六是因时代不同而废弃或因规范化而淘汰的，如“党团”改为“党组”，“薪水”等改为“工资”。

刁先生从人物称谓类、事物称名类和动作行为类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词语潜隐情况做了周详细致的考察。本文不能全面引述考察的结果，只能拣最主要、最常见的介绍给大家。

尊、令、贤、贵、高、大、玉、惠、赐、垂等表敬的语素，和家、舍、小、拙、愚、鄙、敝、卑、窃等表示自谦的语素是潜隐得最早最深的。也就是说，你在毛时代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尊堂、令郎、贤妻、贵体、高寿、大札、玉照、惠函、赐教、垂询、家母、舍弟、小女、拙文、愚兄、鄙见、敝姓、卑职、窃以为等词的踪迹。尤其在文革期间，使用这些词没准儿会给你带来批斗之祸，抄家之灾。不过，也有例外，“与大批含谦敬语素的动词性词语退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组含表敬语素‘敬’的词语较多使用，它们的对象，主要是毛泽东，这一类词语有‘敬祝、敬献’等。”¹⁰

“红语”之所以要排斥这些词语，理由很简单，它们代表着“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会惊诧地质问：称人家的母亲、儿子、妻子为尊堂、令郎、贤妻，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称自己的文章、见解、女儿为拙文、鄙见、小女，是表示自己的谦虚。这些谦敬词语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跟“四旧”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破四旧为什么不破官本位？不破等级制？不破权力崇拜？不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如今，同志不时兴了，先生没人用了，小姐成了三倍，老师成了敬称，牛B成了敬语，代表着旧思想旧文化的谦词卷土重来，这就是“红语”立的四新吗？

从语言看社会，可以说，“红语”之兴，意味着思想之乱。从社会看语言，可以说，道德之衰，实乃“红语”之功。

五、“红语”的新气象

“红语”最大的长处是与时俱进，毛时代“红语”禁用表达爱情、亲情、乡情的语言，后毛时代的“红语”把性、爱、情人、小三、婚外恋、情色影片，洒遍一国还满。毛时代只有阶级情、党国情、领袖情。改开一来，“红

¹⁰ 详见刁晏斌：《文革语言研究》，第二至第四章。

语”立马把爱国情、民族情、乡土情，弄得满坑满谷。毛时代的同志，现在让位给了哥们儿、姐们儿、闺蜜、亲。毛时代潜伏在记忆中的谦敬词语，隐身于书本中的陈言旧句，也纷纷卷土重来。

这种新旧杂糅的语言，还是红色语言吗？

是，当然是。红色文化就是一个新事与旧器共存，精华与糟粕一体之物。作为红色文化的下属，“红语”当然还是“红语”。

“红语”发达，新词似海。想当年，八亿人都挤在一条道上。张口基本词，闭口一般词。现如今，“红语”移步换形，政治词汇出新出奇：一个核心、两个维护、四个确立、四个自信、四个应该、十年浩劫、百年大计、千年规划图……。军事词汇与时俱进：战狼影院、战狼外交、战狼精神、战备转移、战略模糊、战略机遇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粗口更新换代，从“X你妈”升华到张嘴就是BBB，粗口脏话从知青红小兵遍及当下的知识界。

“红语”发达，新人辈出。“毛粉老左”念念不忘十七年，“乌有之乡”殷殷期盼“七八年再来一次”，熟稔“红语”的，可以戴上博士帽。为“红语”捧场加注的，可以当教授博导。他们不会为词义之真伪烦恼，只会为绿肥与红瘦操心。■

【百年国史】

下乡知青流动与经济收入研究

——以问卷调查为方法

乔晞华

内容提要：根据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全国各省在下乡知青的安置方面可以分为四大类：输出类、输入类、省内流动类和特殊类（浙江省）。文革中自愿积极下乡的比例比文革前明显减少，被强制下乡的明显增加，这一趋势在所有家庭出身中均有体现。当局采取强制手段，逼迫知青下乡，为上山下乡的失败埋下祸根。下乡是一条完全陌生的谋生之路，知青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靠自己嫩弱的身体谋得温饱。根据问卷调查的发现，男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

农子弟，红类政治面貌，有幸被调离田间劳动的脱产知青，他们的收入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多数知青挣扎在温饱线上，有的甚至辛苦一年，收入为负数。

关键词：上山下乡、动员、知青流向、问卷调查、收入。

上山下乡¹¹是1957年中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首次提出的。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动员分为两个阶段，开始是宣传农村青年返乡参加劳动，以后逐步鼓励城镇青年下乡参加劳动。1961年前主要动员对象是农村青年，也称为返乡知青。1962年后，中共开始强调动员城镇青年。面对“大跃进”带来的困难，中共开始实施减少城市人口政策，动员组织城镇人口下乡。各地开始动员工作，如组织知青到农场参观，地方领导接见知青代表等。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人被树为典型，推动了上山下乡的开展。

1964年初，中共开始建立知青下乡管理机构，如“中央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各级地方政府也建立起相应的分支机构，知青下乡管理被纳入正式管理轨道。返乡青年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点下乡，所以管理是分散的。而城镇青年下乡则是到陌生的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加强管理，知青集体户（即知青点）应运而生（王富秋，2019）。

1964年，中共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形成，其要点是，在国家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送知青到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定宜庄，1998）

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简述

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的研究，邱新睦（2003）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1）萌芽期，1970年代中期到1985年；（2）初潮期，1986年至1994年；（3）高潮期，1995年至1999年；（4）后高潮期，2000年至今。

¹¹ 本文摘编自笔者2021年11月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与大返城：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

萌芽期的代表作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该书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客观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及其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做了精细分析和精辟议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外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问题最全面、最详细、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

初潮期中，伴随文革研究的展开，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开始引起学者注意，出现第一批研究文章，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著作相继问世。虽然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并非真正的研究成果，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高潮期间的代表人物包括定宜庄（1998）、刘小萌（1998）、金大陆（1998）等，学者们梳理归纳浩繁的史料数据，挖掘出前人忽略但具有学术意义的史实，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2000年以来的后高潮期，研究逐步降温，但仍不乏经典之作，如潘鸣啸（2010）的《失落一代》，被称为“知青学”集大成专著。有学者感叹，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知青在中国，知青学却在海外。该著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裴毅然，2009）。金光耀和金大陆（2014）从中国现有6,000余部县级以上新编方志中，查阅、复制和编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资料。同时，众多知青不甘沉寂，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呈现新特点：（1）互联网异军突起，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新园地，（2）海外学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关注和参与；（3）知青学者肩负社会责任，在研究中默默求索。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问卷调查

王江（1996）曾探讨知青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指出必须重视和加强定量分析。梁海祥（2014）采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辨识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对于婚姻的影响。王甫勤（2011）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资料，比较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研究两者的经历在整体上对阶层分化、收入分配和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刘愿（2016）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检验知青群体接受教育的年限及其代际的补偿效应。

然而，迄今为止全面分析知青情况的定量分析研究并不多见。笔者于2020年6月17日在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¹²上启动“关于上山下乡情况的问卷调查”¹³。调查的对象不仅包括知青，还包括其他下乡人员，如文革前的精简人员，文革中被迫离开城市的居民。考虑到许多受访者已经进入垂暮之年，问卷设计得尽量简单，并且明确告知，可以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代亲友填答。

问卷调查共有25个问题：（1）下乡前所在地；（2）出生年份；（3）性别；（4）家庭出身；（5）本人政治面貌；（6）下乡前职业；（7）文革中是否参加群众组织；（8）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9）下乡地；（10）下乡的安置形式；（11）动员下乡时的心情；（12）下乡劳动的情况；（13）下乡期间的收入；（14）下乡期间的婚姻情况；（15）下乡期间的心情；（16）当地农民的态度；（17）返城时间；（18）返城方式；（19）本人最终职业；（20）子女发展情况；（21）是否与下乡时的农民有来往；（22）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23）如何评价上山下乡；（24）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经历；（25）是否希望后代再次经历上山下乡。

问卷调查是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近40年之后进行的，受访者在经历数十年后，应该能够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调查以匿名填写网上问卷的方式，任何人（包括主持调查的笔者）无法追踪到受访者，绝大多数受访者是与笔者素不相识的志愿者，不受任何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当年的民众由于大环境的压力，不敢说真心话，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访者无须再掩饰自己，无需对自己的真实想法加以掩饰。

截至2021年6月16日（历时整整一年），共有2,830人参与网上问卷调查。其中八人因填写基本空白无法使用，实际有效受访者为2,822人。除少数人口稀少的边远省份，大多数省的受访者人数均达到或超过20人。受访者的原住地分布在全国27个省（宁夏和西藏缺）的113个大、中、小城市，27个地区和57个县（镇）。受访者的下乡落户地遍布全国28个省（西藏缺）的640个县，58个城市市郊，其中还有不少受访者只说明在建设兵团或农场，并未注明兵团或农场所在地区或县。受访者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21年，最小的出生于1960年以后。受访者中最早的下乡时间是1956年3月。处于老三届年龄段的

¹² Survey Nuts 网站。

¹³ 本研究完全是笔者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科研机构的资助。问卷调查从设计、数据收集、整理到分析，均由笔者独自完成。

受访者为1,558人，占受访者总人数的55%。受访者中，男性有1,501人（54.6%），女性有1,250人（45.4%）。受访者中绝大多数在下乡前是中学生，还有少量小学生和大中专学生。此外，受访者中还有近100人（约4%）下乡前是工人、干部、科员、学者、无业人员或城市居民。虽然此类人的人数不多，但为研究非学生类下乡人员提供了有用信息。

下乡人员的流向

上山下乡是从城市向乡村的大规模移民，但是各省的流向各异，有的省以输出为主，有的省以输入为主，也有的省以省内流动为主。以下是各省间和省内外受访者的流向情况：

表1. 各省受访下乡人员的流向

原产地	输出率	输入率
安徽	7%	76%
北京	89%	0%
福建	4%	0%
广东	18%	10%
甘肃	0%	42%
广西	7%	7%
贵州	0%	63%
湖北	0%	13%
河北	7%	45%
黑龙江	0%	88%
湖南	4%	4%
河南	3%	11%
吉林	0%	63%
江苏	15%	8%
江西	0%	69%
辽宁	6%	2%

原产地	输出率	输入率
内蒙	0%	92%
宁夏	0%	100%
青海	0%	88%
四川	11%	1%
山东	21%	5%
上海	83%	0%
陕西	2%	53%
山西	8%	90%
天津	87%	0%
新疆	0%	97%
云南	0%	82%
浙江	52%	6%

注：输出率 = $\frac{\text{赴外省人数}}{\text{该省待安置总人数}}$ ，输入率 = $\frac{\text{来自外省受访人数}}{\text{该省落户受访者总人数}}$ 。

如上表所示，各省的输出和输入率是不同的。例如，北京显然属于输出省，91%受访者落户到外省，只有11%的受访者留在本市郊区农村，外省无一人进入北京郊区。但是，内蒙与北京成鲜明对照，待下乡受访者中无一人落户到外省，而输入本省的外地下乡人员占落户本省下乡人数的92%。换言之，在落户内蒙的下乡人员中，九成以上都是外来户。还有一类则处于两极的中间，如江苏，待下乡的受访者中，只有15%落户外省，85%的人员留在本省。输入江苏的外省人仅占落户本省总人数的8%。也就是说，落户江苏的受访者中，本省人占九成以上。

关于知青下乡的研究很多，迄今为止，系统地对知青下乡具体流向的研究并不多见，进行定量分析的则更少。关于这方面研究，引用最多的是刘小萌（1998）的研究结果和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附件的数据。本节试图对各省下乡流向采用聚类分析法¹⁴分类，结果如下（关于聚类分析法的原理和计算，此处不赘，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附录）：

¹⁴ Cluster Analysis, CA.

表2. 各省下乡人员流向分类

类别 ¹⁵	省 ¹⁶	输出率	输入率
输出类 (3)	北京、上海、天津	87%~89%	0%
输入类 (14)	安徽、甘肃、贵州、河北、黑龙江、吉林、江西、内蒙、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新疆、云南	0%~7%	42%~100%
省内流动类 (10)	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河南、江苏、辽宁、四川、山东	3%~21%	0%~13%
特殊类 (1)	浙江	52%	6%

三个直辖市属于输出类省，它们的输出率至少 87%，三者的输入率皆为零，用“只出不进”来形容三个直辖市不为过。第二类是输入类省，输出率不超过 7%，而输入率则高达至少 42%，有的省高达 80%以上，如黑龙江、内蒙、山西和云南等。省内流动类的特征是，输出率低的同时，输入率也低，最高均不超过 21%。输入类省都是边疆或落后地区，人烟稀少，内地省派送大量的下乡人员（尤其是知青）支援边疆。省内流动省份大多是内地省，工农业相对发达，人口众多。

值得一提的是特殊类——浙江。该省的输入率与省内流动类相近，但是输出率却远高于后者。输出的下乡人员主要流向是黑龙江，其次是内蒙。如果人为地强行指令分类软件将各省分为三类的话，浙江则属于输出类，与三个直辖市同伍，因为浙江与输出类省更为接近。

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二：（1）浙江山多地少，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75%，平坦地面积仅占 20%，河流和湖泊占 5%，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人口密度高，安置知青有困难。（2）受上海影响，浙江靠近上海，与上海关系密切，推行相似政策。上海一直是资源缺乏城市，中共建政后，主要依靠国家计

¹⁵ 括号内为同类省的数量。受访者中没有落户到西藏的下乡人员。

¹⁶ 个别省的受访者总数较少，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如宁夏、青海、贵州、甘肃、新疆。

划调拨和全国各地（尤其是周边省）的支持。在周围几个省中，安徽贫穷落后，江苏较富裕，但在政治上与上海素来不和，浙江与上海却较为密切。

例如，浙江岱山县的百姓多以渔业生产为生，下海渔民持有流动购粮证，可在全省沿海各地购粮。秋汛捕蟹季节，渔民可以凭此证到上海补给粮食¹⁷。当时只有全国粮票可以跨省购粮，浙江地方粮票跨省得到上海供应，在全国可能是独此一例，上海与浙江之间关系略见一斑。关系密切必然受其影响，文革中，上海受中央文革直接控制，执行极“左”路线，上山下乡输出率相当高，其政策影响了浙江¹⁸。以下各省输出去向和输入来源的情况：

表 3. 各省输出去向和输入来源

类别	省	输出去向	输入来源
输出类	北京	内蒙、黑龙江、陕西、山西、云南、吉林、河北、河南、湖北、宁夏、湖南、江西、新疆、广东、安徽、甘肃、江苏、辽宁、四川、山东	
	天津	内蒙、黑龙江、河北、山西、甘肃、吉林、江西	
	上海	安徽、黑龙江、江西、云南、吉林、江苏、贵州、内蒙、新疆、甘肃、广东、青海、山东、浙江	
	浙江	黑龙江、内蒙、江西、新疆	上海
输入类	安徽	吉林、陕西	上海、江苏、四川、北京
	甘肃		上海、北京、四川、天津
	贵州		上海、辽宁

¹⁷ 参见 http://www.zhoushan.cn/rdzz/ggkf2018/zsggkf2018/201810/t20181028_903189.shtml.

¹⁸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抽样偏差。但是来自浙江省的受访者达到 33 人，从统计学角度说，样本数大于 30，可以视为样本足够大，且 33 位受访者并无异常，因此可以排除抽样偏差的可能。

	河北	黑龙江、内蒙	天津、北京、辽宁、四川
	黑龙江		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河北、四川、山东
	吉林		上海、北京、安徽、辽宁、天津
	江西		上海、四川、天津、浙江
	内蒙		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山西
	宁夏		北京
	青海		山东、上海
	陕西	河南	北京、安徽、江苏
	山西	内蒙	北京、天津
	新疆		江苏、上海、北京、湖南、河南、四川、山东、浙江
	云南		北京、上海、四川
省内 流动类	福建	黑龙江	
	广东	辽宁	上海、北京、湖南
	广西	湖南	湖南
	湖北		北京、湖南
	湖南	广东、广西、湖北、新疆、	北京、广西
	河南	内蒙、新疆	北京、陕西、江苏
	江苏	内蒙、新疆、安徽、河南、江西、 陕西	上海、北京
	辽宁	内蒙、贵州、河北、吉林	北京、广东

四川	云南、安徽、甘肃、河北、黑龙江、江西、新疆、	北京
山东	青海、内蒙、黑龙江、新疆	北京、上海

具有知青经历的学者邓鹏（2013）指出，文革前有近13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尽管有国家层面“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且表面上多为高考、中考的落榜生，事实上却存在着阶级路线的“政治歧视”，以至赴农村“脱胎换骨”成为唯一的出路。

以南京师范学院¹⁹附属中学（简称“南师附中”）为例。该校于1965年被国家教育部定为全国中学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之一²⁰。1964年，南师附中树立放弃高考、背离家庭、落户农村的学生典型。南师附中和另外二所中学的毕业生总共72人主动放弃高考，直接到农村落户，被誉为“七十二贤”，成为全国中学生的楷模。文革前夕，形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的校园氛围。学校树立的为革命而学的教改典型（红五类子弟）登上全国性刊物《中学生》。与此同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则忙于与家庭划清思想界限（王虹，2020）。以下是对比文革前和文革中受访者家庭出身²¹的结果²²：

表4. 家庭出身在两个时段的对比（N=1,705）

时间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文革前（1956-1966） ²³	0.4%	4%	4%	11%
文革中（1967-1978）	99.6%	96%	96%	8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¹⁹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²⁰ 其他三个学校分别是，上海育才中学、北京景山中学、辽宁黑山中学

²¹ “革军革干”出身意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工人农民”出身意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以上两类属于红五类出身。黑五类出身意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灰五类出身介乎于红五类与黑五类出身之间，如小业主、个体商贩、中农、上中农等。走资派是文革中出现的分类，文革前和文革后属于革军革干的红五类。

²² 由于调查问卷的设计缺陷，有不少受访者（1,117人，占总受访人数的40%）无法确定下乡的时间。

²³ 受访者中有几位是很早就下乡的人员，例如一位生于1936年，女，1958年下乡到四川，一位生于1940年，男，1957年下乡到辽宁，还有一位生于1941年，女，1956年下乡到黑龙江。文革前下乡的受访者在答卷中特别提醒笔者，他们下乡时还没有“插队”的说法。

如上表所示，黑五类子弟中，文革前下乡的占11%，革军革干子弟几乎为0，工人农民和灰五类子弟各占4%，稍高于革军革干子弟，但是明显低于黑五类子弟。零假设检验结论是家庭出身之间的差异显著（置信度超过99%）。以上结果验证了文革前下乡政策中政治歧视的存在。正如刘小萌（2015）所说，文革前的知青是“先淘汰后下乡”。中共先把城市毕业生按家庭出身划线，许多品学兼秀的学生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剥夺升学和就业的资格，送到农村。

文革开始，上山下乡暂停。1967年初，中共发出通知，要求知青们回农村去安心劳动。北京中学生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拉开了文革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上山下乡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被拔高到政治层面加以宣传和实施，与青年人主动参与有着明显区别。1968年的上山下乡属于文革中极“左”政策实施阶段，知青实际上成为遵守命令的被动参与者，上山下乡被誉为“一场伟大的革命，被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接受“再教育”“反修防修”伟大举措（马昌海，2009）。以下是家庭出身与对上山下乡态度的情况：

表 5. 文革中受访者被动员的态度与家庭出身的关系（N=2,242）

对下乡动员的态度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自愿积极参与	43%	43%	30%	15%
被迫无奈，未被强迫	39%	37%	50%	48%
强制下乡，不得不走	18%	20%	20%	3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上表显示，43%的红五类子弟是自愿积极参与上山下乡的，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分别只有30%和15%。被强制下乡的黑五类子弟高达37%，革军革干子弟仅18%，不及黑五类子弟的二分之一。被迫无奈下乡的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比红五类子弟高了约十个百分点。在下乡的自愿程度方面，红五类子弟明显高于非红五类子弟。零假设检验结论是，家庭出身与自愿态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别，置信度大于99%。

我们进一步分析文革前下乡动员的态度。以下是家庭出身与对动员的态度：

表 6. 文革前和文革中下乡动员的态度与家庭出身的关系 (N=1,498)

	对下乡动员的态度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文革前	自愿积极参与	100%	72%	48%	23%
	被迫无奈, 未被强迫	0%	14%	44%	54%
	强制下乡, 不得不走	0%	14%	8%	2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文革中	自愿积极参与	41%	39%	29%	15%
	被迫无奈, 未被强迫	40%	39%	48%	47%
	强制下乡, 不得不走	19%	22%	23%	3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文革前,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 零假设检验显示, 家庭出身与自愿态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置信度大于 95%²⁴。如上表所示, 文革前自愿积极参与的比例较高, 红五类高达 72%和 100%, 灰五类和黑五类分别是 48%和 23%。被强制下乡的则较少。文革前, 下乡人员自愿的更多些, 被迫的相对少些。

文革中自愿积极参与总数比文革前明显减少, 被强制下乡总数却明显增加。黑五类自愿下乡人数从 23%下降到 15%, 文革中有 85%的黑五类子弟是被迫或被强制下乡的。这一下降趋势在所有家庭出身中均有体现, 灰五类、工农、革军革干子弟的自愿下乡率分别从 48%, 72%, 100%下降到 29%, 39%、41%。对数线性模型²⁵分析发现, (1) 文革前与文革中下乡人员对动员的态度有显著性差别, 时间因素对态度的影响统计学上显著, 其置信度大于 99%; (2) 不仅如此, 还同时存在家庭出身的影响, 非红五类子弟被强迫下乡的比红五类多, 置

²⁴ 因样本较小, 采用费希尔精确检验 Fisher's Exact Test。

²⁵ Log Linear Model.

信度大于 99%（关于对数线性模型的原理和计算，此处不赘，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附录）。

尽管当时的动员搞得轰轰烈烈，下乡人员心里却是无奈、不情愿。余杰（2021）曾描写过下乡一刻的情景：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虽有喧天锣鼓、飘扬彩旗，更多的却是悲悲戚戚的哭声和千叮咛万嘱咐。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时，车上车下霎时间爆发出哭声、喊声、呼号声。站台上的人群像一股洪流在向火车边涌动，而车上的一个个窗口伸出无数双舞动着的、无助的手，还有趴在窗前痛哭的人。当列车启动的那一刻，有尖叫的、呐喊的、狂呼的，还有昏厥过去的老人！这就是文革中下乡民众心情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自愿或是被强迫下乡，有些知青希望通过下乡能上学或招工。以下是受访者对上学和招工抱有希望的情况：

表 7. 家庭出身与抱有上学招工想法的关系（N=2, 590）

家庭出身	抱有上学、招工想法		置信度
	是	否	
革军革干	8%	92%	>95%
工农	10%	90%	
灰五类	6%	94%	
黑五类	5%	95%	

非红五类子弟（尤其是黑五类子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他们中有少数人（5%~6%）对上学和招工抱有幻想，但是比例明显低于红五类子弟（8%~10%）。家庭出身与抱有幻想的关系有显著差别，置信度大于 95%。

政治歧视不仅表现在是否下乡方面，而且存在于下乡安置方面。建设兵团和农场相对于插队到农村生产队，条件要好些，红五类子弟在能否进入建设兵团或农场方面也占了先机。以下是受访者家庭出身与下乡安置的情况：

表 8. 家庭出身与下乡安置的关系（N=2, 524）

下乡安置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插队	66.1%	57.6%	68.6%	65.4%
建设兵团/农场	31.3%	40.8%	28.7%	25.4%
全家下放	2.6%	1.6%	2.7%	9.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上表显示，红五类子弟（31.3%，40.8%）进入建设兵团或农场比非红五类子弟（28.7%，25.4%）要高一些，黑五类中全家下放的比（9.2%）高于其他类子弟（1.6%，2.6%）。受访者中非红五类子弟插队和全家下放的较多，红五类子弟进入建设兵团和农场的较多，家庭出身与下乡安置存在显著相关性，置信度大于99%。

文革中，当局采取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如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和街道居委会轮番上门劝说和威逼，由家长的工作单位出面施加压力等等。受访者中被迫无奈和被强制下乡人数高达三分之二（67%）。除了少数先锋者，很多城市中学生犹豫、不情愿，不甘心、想不通，但他们还是或出于无奈，或是被强迫下乡了，这就为上山下乡的失败埋下祸根。

下乡期间的经济收入

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时的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知青们从城市一下子被抛进苍苍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心理落差是难以想象的。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以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耻，要求他们注意磨炼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然而严酷的事实使这些天真烂漫的青年终于从乌托邦理想回到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中（马昌海，2009）。

对于知青来说，下乡是一条完全陌生的谋生之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靠自己嫩弱的身体谋得温饱。建设兵团和农场里的知青，因为每月有固定工资或津贴，生活相对稳定些。而插队落户到农村的知青，则与广大农民一样，出工一天记一天的工分，一年的收入要等数月之后甚至年终时，由生产队决算后才能知道。他们的谋生道路要艰难得多。表4.1是受访者中建设兵团、农场和插队人员收入的分布。据当时的统计，自给标准为120~180元（刘小萌，

1998)，我们取中间数 150 元为自给标准，将收入分为以下四类：（1）150 元以下；（2）150-299 元；（3）300-499 元；（4）500 元及以上。

表 9. 受访者年收入与下乡安置形式的关系 (N=2, 435)

收入类别	建设兵团	农场	插队 ²⁶	合计
150 元以下	15%	29%	72%	56%
150~299 元	12%	35%	16%	17%
300~499 元	67%	30%	8%	22%
500 元及以上	6%	6%	4%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插队受访者中，有 72% 的人年收入低于自给标准（以下称为“低收入”），低收入人数远高于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受访者。在经济收入方面，插队、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之间的差异显著，置信度大于 99%。而且，农场与建设兵团知青的收入差异也显著，置信度大于 99%。仅从低收入人群可以对三者间的差异略见一斑，建设兵团受访者低于自给标准约 15%，农场知青有 29%，两者收入均大大高于插队受访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插队低收入的受访者中，有 90 人收入是负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结果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 332 名受访者年终结算扣除口粮后，没有任何现金收入，这两类受访者占插队低收入受访者总数的 25%（表中未列出）。

一位受访者在调查问卷中愤愤地写道，“我们一个集体户在生产队干了十年，临走时，一算账还欠生产队 100 多元。每年冬天结账的时候，全是账面上的数字，没有钱。应该给你的，也没有钱，欠着。插队知青最苦、最惨。坐十年牢房，也不可能欠钱！”曾有一位女知青因收入问题而自杀未遂，她在遗书上写道：“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靠家庭，只好离开人间”（刘小萌，1998）。下表是低收入插队受访者在各省的分布：

²⁶ 问卷调查的关于下乡时“年收入”的回答中，插队受访者回答有三种类型，（1）明确说明扣除口粮后的现金收入，如“扣过粮款后大约 50 多元”；（2）明确的年收入，如“0.26 元 X365”，（3）金额数，如“120 元左右”。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通过与多位下过乡的知青交谈，认为有可能个别受访者指的是第一种情况，即扣除口粮后的现金收入。但是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本文默认是第二种情况，即年收入，包含口粮。对于第一种回答，口粮按每年 100 元计算，即自给标准 150 元的三分之二。

表 10. 收入低于 150 元的受访者下乡地区分布 (N=1, 564)

占插队总数	省
80%~100%	青海、河北、贵州、山西、陕西、天津、河南、湖南
60%~80%	江苏、安徽、山东、四川、北京、辽宁、甘肃、吉林、江西、云南、广西、河北、浙江
40%~60%	福建、广东、内蒙、上海、新疆
<40%	黑龙江

下放到福建、广东、上海的插队受访者收入略高一些是预料之中的事，内蒙、新疆、黑龙江地区插队的受访者低收入情况好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知青有不少在兵团或农场。插队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苏的受访者，低收入状况可能出乎有些读者的预料。江苏的受访者低收入人数占插队总数的 78%，比例高于安徽、山东、甘肃、江西等地。这是因为，虽然江苏的南部地区（常称为“苏南”）比较富裕，但是其北部地区（常称为“苏北”）却非常贫困，如泗洪县、洪泽县、泗阳县、泰兴县等。

上世纪 70 年代末，据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 13 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 50% 以上，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 70 ~ 80%（刘小萌，1998）。受访者的低收入情况与当时的统计有相似之处。

受访者的收入不仅受地区影响，性别上也有差异。下表是性别与收入的关系：

表 11. 受访者性别与收入的关系 (N=2, 396)

收入类别	女	男
<150 元	59%	53%
150~299 元	17%	17%
300~499 元	21%	24%

>=500 元	3%	6%
合计	100%	100%

如上表所示，女性受访者中低收入占 59%，男性受访者占 53%。男女之间收入之间呈显著差别，置信度大于 99%。知青下乡除了招工、招兵以外，还有不少人通过在农村成为赤脚医生、教师、广播员等，脱离田间劳动。下表是受访者在农村劳动情况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 12. 受访者在农村劳动情况与收入的关系 (N=2, 226)

收入类别	一直在田间劳动	成为脱产人员	长期待在城中
<150 元	61%	41%	75%
150~299 元	17%	19%	7%
300~499 元	18%	33%	18%
>=500 元	4%	7%	0%
合计	100%	100%	100%

显而易见，抽调成为脱产人员的收入比一直坚持在田间劳动的受访者高。长期待在城中的受访者由于没有劳动，收入自然受到影响，成为低收入者较多。收入与在农村劳动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置信度大于 99%。下表是各类受访者在农村坚守劳动的情况。

表 13. 受访者返城前在农村劳动的情况 (N=2, 536)

劳动情况	建设兵团	农场	插队
一直在田里劳动	63%	74%	73%
成为脱产人员	36%	23%	24%
长时间待在城里	1%	4%	3%
合计	100%	100%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上调脱离田间劳动成为脱产人员的机会方面，建设兵团比农场和插队似乎更占优势。建设兵团与农场、插队的差异显著，置信度大于99%，但是农场与插队之间则无显著差别（置信度小于90%）。下表是家庭出身与在农村劳动情况的关系：

表 14. 受访者家庭出身与返城前劳动情况的关系（N=2,369）

劳动情况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一直在田里劳动	77%	75%	66%	68%
成为脱产人员	21%	23%	31%	27%
长时间待在城里	2%	3%	3%	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在成为脱产人员方面优于红五类，一直在田间劳动的红五类分别为77%和75%，灰五类和黑五类却分别为66%和68%。非红类子弟下乡后受到重用的人数超过红五类子弟，原因可能是：（1）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在校成绩总体上超过红五类子弟，到农村后很快表现出他们的才能；（2）他们由于出身不好，在行为举止上大多小心谨慎，努力表现；（3）许多农村地区的政治气氛比城市淡薄，对非红五类子弟的压迫相对少些，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非红五类子弟（特别是黑五类子弟）的发展；（4）革军革干子弟在返城前一直在田里劳动的比例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返城了。家庭出身与在农村劳动情况的关系有显著关系，置信度大于99%。

知青的收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表是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受访者收入的综合性分析（线性回归的理论及计算此处不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附录）：

表 15. 受访者年收入线性回归分析（N=1,848²⁷）

变量	参数	置信度
截距	-3.35	
年龄	2.38	>95%

²⁷ 以下结果不包括年收入达到或超过2000元的受访者，其中最高者为4300元。被删人数为20人，他们的年收入可能确实达到2000元或以上，但是这些异常值会影响整体的预测。

性别（女性为参考类）	男性	19.52	>99%
下乡安置（本省为参考类）	跨省安置	38.40	>99%
下乡安置形式 （插队为参考类）	建设兵团	159.37	>99%
	农场	113.84	>99%
家庭出身 （革军革干子弟为参考类）	工农子弟	26.78	>95%
	灰五类子弟	12.85	
	黑五类子弟	7.89	
本人政治面貌 ²⁸ （黑五类为参考类）	红类	39.10	>95%
	中等类	5.20	
坚持田间劳动情况 （相当时间在城里为参考类）	脱离田间劳动	59.82	>99%
	坚持在田里劳动	16.86	
$R^2=23.7\%$			

上表显示各变量对收入的影响。理解上述参数的要点是，当参数为正数时，意味着如果该变量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例如，年龄的估算参数是 2.38，这就是说，受访者每增加一岁，收入增加 2.38 元。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个人年龄是 20，另一位年龄是 30，那么后者的估算年收入比前者多 23.80 元。对于置信度小于 90% 的参数，有的学者认为不可靠，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有不同意见。

上述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大多是类别型变量，其参数是相对参考变量而言。例如，相对于女生，男性受访者平均要高 19.52 元。相对于插队受访者，建设兵团受访者的年收入平均高 159.37 元，农场受访者比插队受访者要高 113.84 元。相对于革军革干子弟，工农子弟的年收入要高 26.78 元，黑五类子弟高 12.35 元，灰五类子弟则高 7.89 元。革军革干子弟的收入低于工农子弟，也略逊于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有点出乎预料。工农子弟的收入最高，可能的原因有二：（1）他们出身红五类，并没有因为家庭受到拖累，受重用的机会较高；（2）工农子弟在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生存能力较强且务实，吃苦耐劳的精神不逊于其他出身的受访者。造成革军革干子弟收入最低的可能原因有三：

²⁸ 因党员人数太少，本研究将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归为一类——红类。一般群众在本文中也称为“中等类”，黑五类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1) 革军革干子弟更富有理想因素，主动下乡到艰苦的地方；(2) 不少革军革干子弟在文革中一夜间成为黑崽子，处境比工农子弟差，与黑五类相似，影响了他们在农村的升迁机会，收入受到影响；(3) 还有一部分革军革干子弟很早就返城了。

相对于本人政治面貌是黑五类的人来说，中等类的收入要高 5.20 元，红类则高 39.10 元。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收入方面比其他人占了先机。被抽调成为脱产人员的收入有保障，收入高一些是预料之中的事。如果被抽调脱离田间劳动，年收入平均会比待在城里的高 59.82 元。

总之，男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农子弟，红类政治面貌，有幸被调离田间的脱产知青，他们的收入会相对高一些。

以上结果部分地证实了有的学者（如刘小萌，1998）的研究，跨省插队的老知青困难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 22.4 万知识青年，有 13 万名生活不能自给。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按以上计算结果，如果其他情况相同，虽然插队收入最低，但是跨省安置比本省安置年收入高 38.40 元，所以在解释上述模型结果时还需谨慎。

结 语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表面光鲜，却败絮其中。在下乡动员和安置中，政治歧视显而易见，非红五类子弟受尽压迫，文革前是先淘汰后下乡，大量优秀青年只因出身不好，被拒之校门外。文革中，一刀切一锅端，伤害了更多的人。尽管当时的动员声势浩大，广大知青和下乡人员心里却是无奈、不情愿，不甘心、想不通，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迫或被强制下乡的。下乡后，知青遇到的首要困难是生存关，插队知青超过半数年收入低于自给标准，不少知青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结果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受访者将插队与坐牢相比，抱怨道：坐牢房也不可能欠钱。这一切都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铺平了道路。

迄今为止全面分析知青情况的定量分析研究并不多见，笔者近年进行的问卷调查填补了空白。本文讨论上山下乡的动员和知青下乡后的经济收入问题，今后还将讨论下乡期间的心态、婚恋、与农民的关系、返城、返城后的就业等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关注和投入上山下乡和知青研究的定量分析。■

附录

1. 聚类分析法

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活动之一。分类也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过程之一,是发展理论所需要的思维²⁹。人类通过对事物的分类,把观察到的事物(如人、事件、物体)归入相应的组或类别,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用通俗的话说,分类就是把相近的事物归为一类,相异的事物归入另类。

定量分类分析法需要基于客观的分类指标。什么是分类指标呢?我们用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指标”的作用。医学界测定病人是否患有乙型肝炎病症,通常用两对半指标:即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e抗原、核心抗原和核心抗体。每个抗原或抗体分“阴”性或“阳”性。五个指标共有32种可能,常见的有九种组合。如果五个指标全是阴性,说明过去和现在未感染过乙肝病毒。如果五个指标分别是“阳-阴-阴-阳-阳”(俗称“小三阳”),说明传染性弱。如果是“阳-阴-阳-阴-阳”,那就是常说的“大三阳”。这是急性或慢性肝炎感染,有极强的传染性。该五个指标为诊断乙肝病症提供了方便而又实用的定量依据。定量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数据、分类指标和分类模型确定后,无论用何种计算机、何种软件,均会得到相同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可重复性,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本要求。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非常广泛,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教育学、人类学、化学、气象学、地理学等领域,都可以见到分类学的踪影。复杂的聚类分析与人工智能中的模式识别相关。

聚类分析法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进行分类³⁰,如K均值算法,凝聚层次聚类法,密度聚类算法等³¹。聚类分析也可以用于模糊分类³²。聚类分析法特别适合

²⁹ Aldenderfer and Blashfield (1984).

³⁰ Tan et al. (2005).

³¹ 均值聚类法(K-mean),凝聚层次聚类法(Agglomerativ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密度聚类算法(Density-based clustering algorithm, DBSCAN).

³² Zhang et al. (1994).

于对具有有序数值事物进行分类³³。以下是我们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各省进行分类的经过³⁴：

附录表 1. 各省分类聚类分析历史

1	2		3	4	5
类别数	合并类		省的数量	伪 F 统计量	伪 t^2 统计量
6	安徽	CL16	4	230	13.4
5	CL6	CL10	7	177	14.9
4	CL5	CL8	14	78.4	34.2
3	CL18	浙江	4	103	121
2	CL4	CL7	24	19.4	111
1	CL2	CL2	28	.	19.4

第 4 和 5 列是两个可以用来确定类别数的统计量。伪 F 统计量相对大表示类别数量较好；伪 t^2 突然增加，表示不好，应该保持在前一个分类上³⁵。如上表所示，把各省分为四类（粗体字）相对好些。

2. 对数线性模型

对数线性模型主要用于检测两个以上的类别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检测下乡动员的态度（积极、被迫、被强制）、家庭出身（革军革干、工农、灰五类、黑五类子弟）、时间（文革前、文革中）之间的关系。我们依次命名该三个变量为 A, B, C。表 6 中的实际人数如下：

附录表 2. 时期、下乡动员态度与家庭出身的关系 (N=1,498)

下乡时间 (C)	对下乡动员的态度 (A)	家庭出身 (B)			
		革军革干	工人农民	灰五类	黑五类
文革前	自愿积极参与	2	10	12	5
	被迫无奈, 未被强迫	0	2	11	12
	强制下乡, 不得不走	0	2	2	5

³³ 数学上有序数值称为连续函数。

³⁴ 计算采用 SAS 软件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³⁵ SAS. Chapter 33: The Cluster Procedure, pp. 2060-2061.

<http://support.sas.com/documentation/onlinedoc/stat/131/cluster.pdf>

	合计	2	14	25	22
文革中	自愿积极参与	161	124	156	30
	被迫无奈, 未被强迫	155	122	256	91
	强制下乡, 不得不走	76	70	120	74
	合计	392	316	532	195

如果检测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用卡方检验, 可是现在我们有三个变量, 这就需要用对数线性模型的方法。我们用以下公式来表达附录表 4 中的频次:

$$\ln(F_{ijk}) = \lambda + \lambda_i^A + \lambda_j^B + \lambda_k^C + \lambda_{ij}^{AB} + \lambda_{ik}^{AC} + \lambda_{jk}^{BC} + \lambda_{ijk}^{ABC} \quad (1)$$

F_{ijk} 是上表中各个格子的人数, λ 表示变量的作用 (或叫参数)。以下是三个检测模型的参数:

附录表 3. 对数线性模型参数

编号	模型	影响力	χ^2	自由度	Pr
1	{B*C} A	B*C (P<0.01)	75.36	12	<0.01
2	{B*C} {A*B}	A*B (P<0.01)	13.73	6	<0.01
3	{B*C} {A*B} {A*C}	A*B, A*C (P<0.01)	2.80	4	0.59

模型 1 表示家庭出身、下乡时间与下乡动员时的态度没有关系, 该模型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Pr<0.01), 应拒绝这一假设。模型 2 表示家庭出身与动员时的态度有关, 但下乡时间在态度上没有不同 (A*B, P<0.01), 模型仍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Pr<0.01), 应拒绝这一假设。模型 3 显示不仅家庭出身与动员时的态度有关, 下乡时间也与动员时的态度有关 (A*B, A*C, P<0.01)。整个模型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小 (Pr=0.59), 可以接受这一假设。另外, 公式 (1) 中的最后一项, λ_{ijk}^{ABC} , 可以省去。

3. 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以距离、速度和时间的关系来解释线性回归模型。我们有以下公式求得距离：

$$\text{距离} = \text{速度} \times \text{时间} \quad (2)$$

等号左边的是因变量，随着等号右边的自变量速度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只要知道速度和时间，就可以计算出行驶的距离。把上述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可以分析、解释和推测很多社会现象。线性回归的表达式为：

$$\begin{aligned} y_i &= \beta_0 + \beta_1 x_{i1} + \dots + \beta_p x_{ip} + \varepsilon_i \\ &= \mathbf{x}_i^T \boldsymbol{\beta} + \varepsilon_i \quad i = 1, 2, 3, \dots, n \end{aligned} \quad (3)$$

式中， y 为因变量， x 为自变量， β 为参数。第四章讨论了知青下乡生活，个人收入 y 由一系列因素 x_i 决定，如性别、年龄、家庭出身、本人政治面貌等，计算结果如下：

$$\begin{aligned} y = & -3.35 + 2.38 * \text{年龄} + 19.52 * \text{男性} + 38.40 * \text{跨省} + 159.37 * \text{兵团} \\ & + 113.84 * \text{农场} \\ & + 26.78 * \text{工农子弟} + 12.85 * \text{灰五类子弟} + 7.89 * \text{黑五类子弟} \\ & + 39.10 * \text{红类} + 5.20 * \text{中等类} + 59.82 * \text{脱产} + 16.86 * \text{坚持劳动} \end{aligned} \quad (4)$$

除年龄外，其他变量为0（非）或1（是），未出现的类别为参考类别。如性别中，女性为参考类，计算女性时不用加，如果是男性，则变量“男性”为1，乘上19.52。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男性比女性年收入增加19.52元。

参考文献

Aldenderfer, Mark and Blashfield, Roger. 1984. *Cluster Analysis*.
Newbury,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ernstein, Thomas P. 1977.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Tan, Pang-Ning, Steinbach, Michael, and Kumar, Vipin. 2005. *Introduction to Data Mining*. Pearson Addison-Wesley.
- Zhang, Joshua, Brody, Chalres J., and Wright, James D. 1994. "Soci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Fuzzy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2, pp. 171-186.
- 邓鹏。2013。“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
- 定宜庄。1998。《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金大陆。1998。《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光耀、金大陆。2014。《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愿。2016。“弥补那逝去的青春：知青对子女教育的代际补偿研究。”《世界经济》2016年第5期。
- 刘小萌。1998。《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小萌。2015。“不要美化上山下乡。”《文学城论坛》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842956.html>
- 马昌海。2009。“回首上山下乡运动。”《炎黄春秋》第8期
- 潘鸣啸。2010。《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 裴毅然。2009。“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开放杂志》10月号。
- 邱新睦。200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83期）。
- 王虹。2021。《南京师范学院附中教育改革文献资料（1964-1966）》。美国华忆出版社。

王富秋。2019。《“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辽宁省北票乡村“知青”研究》。

博士论文。<http://eprints.utar.edu.my/3652/1/ICS-2019-1508257-1.pdf>。

王甫勤。2011。“‘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王江。1996。“关于‘老三届’人研究的方法论。”《中国青年研究》，

1996/4，13-15页。

余杰。2021。“知青口述：上山下乡的那一刻。”《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补白】

黎澍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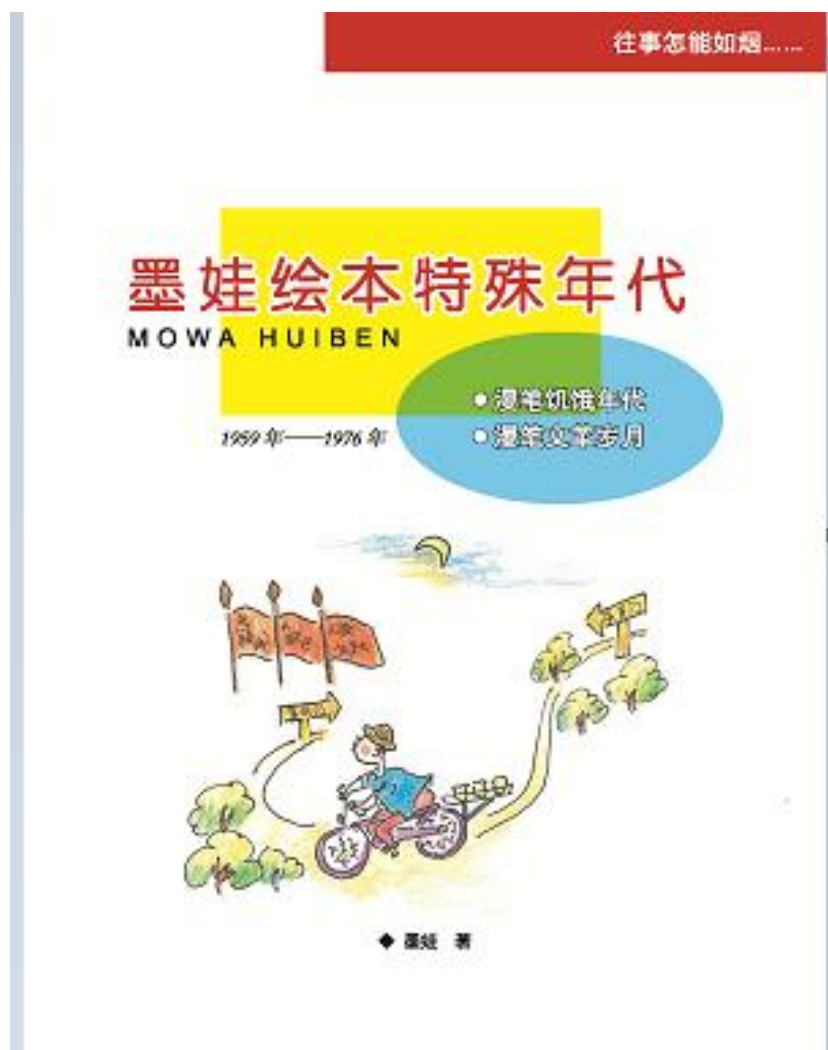
李 锐

我们议论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黎澍说，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首要条件，……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他做过极为理性的分析：污染是与进步相伴而来，每一进步都必定带来某种污染。开个工厂，生产各种产品，必定同时出废气、废水，污染环境。精神产品也一样，阳春白雪来自下里巴人，精华出于糟粕。没有下里巴人，何来阳春白雪？没有糟粕，何来精华？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轻抛，它可以肥田，种出粮食蔬菜。治理污染是必要的，清除或反对则是不合理的。

——《黎澍十年祭》第32-3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百年国史】



人物点滴

墨娃（张柏联），北京旗籍后生。生在饥荒年代，长在文革岁月。先学法律，后修文物。不党不群，无视权政。幼习书法，少喜绘画，博览杂书，摆弄文字。友无白丁，不屑玉帛。

人生的悲哀：曾经相信的却都是谎言。



绘本特殊年代 (1959--1966)

——漫笔童年饥饿

墨 娃

岁月荏苒，往事依稀，记住苦难比记住幸福更加鞭策人心。它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看世界的角度。我们可以用心灵，用文字记录成长中的点滴趣事，也可以用画笔誊写难忘的凄苦岁月。

与饥饿的往事干杯，用心去记录，就是不能忘却渐行渐远的苦难历程。这真实的写照，不仅激励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更提醒我为要不断对一个民族的悲剧反思、审视和批判。

2021-5-2

特殊年代

墨娃绘本

上册



·3·

我爸说，我们家是满、蒙、汉大全席，所以能手特多……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人，听我姥姥说，我们的先是三百多年前跟着“龙”进了帝都，现在我们是一个五口之家，我爸、我妈、大哥、二哥，还有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爸我妈从祖宅搬出，到了府右街枣林大院胡同，我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写起……



1959年6月，我出生在离家很近的北大医院。家里添了一个闺女，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我爸，去百货大楼买了块当时最贵的香皂（据说一块钱）。而那时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是每个人一个月8块钱。

天很热，我总哭闹，我妈就这样抱着我，在屋里转悠……



满月一过，我妈赶紧上班了。
白天是我大姥姥照看我，还有我大哥放
学后，我二哥从幼儿园回来都搭
把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满月一过，我妈赶紧上班了，白天是姥姥看着我，大哥放学后，就上大哥照看，二哥从幼儿园回来，搭把手帮助大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北京的七月天很热，正好赶上
小学的大哥放暑假，他每天要去
幼儿园接我二哥，还要给我洗尿布。
一晾就是一院子，很是辛苦……



北京的七月，天很热，上小学的大哥放暑假，他每天要去幼儿园接二哥，还要给我洗尿布，一晾就是一院子，很是辛苦……



我爸我妈在复兴门外的广播电台
上班，时逢大跃进，他们每天上班很早
出门，天黑了才回家，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我爸我妈在复兴门外的广播电台上班，时逢大跃进，他们每天上班很早出门，天黑了才回家，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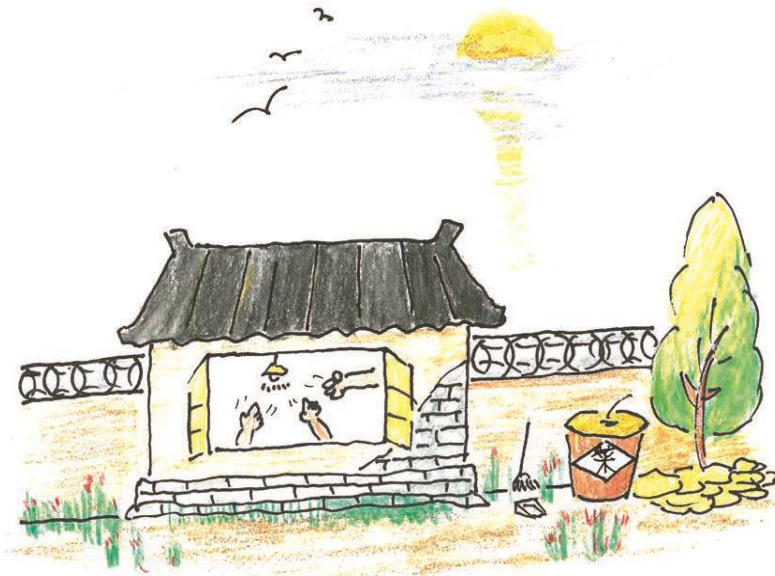
...

...

特殊年代

墨娃绘画

上册



转眼到了1960年，春节一过，市场上一天比一天萧条，粮食供应一下子就紧张起来。那时候人口多的家庭，孩子们经常为了一口饭打了起来。我们家后院那家哥们经常吵架，好像还是为了一块窝头……为此，我妈早早就腌上了一水缸菜。

·15·

转眼到了1960年，春节一过，市场上一天比一天萧条，粮食供应一下子就紧张起来，那时候人口多的家庭，孩子们经常为了一口饭打了起来，我们家后院那家哥们经常吵架，好像还是为了一块窝头……

为此，我妈早早就腌上了一水缸菜。



全国的粮食每况愈下，大家都在
饥饿度日。我爸我妈在机关主动
减口粮。我爸从32斤减到28斤，我妈
从30斤减到24斤。大家都被饿的
浮肿。很多回，我爸上楼到三层就
走不动了，半天才缓过来。我长大了，我妈总
跟我的叨……



全国的粮食每况愈下，大家都在饥饿中度日。我爸我妈在机关主动减口粮，我爸从32斤减到28斤，我妈从30斤减到24斤。大家都被饿得浮肿。很多回，我爸上楼到三层就走不动了，半天才缓过来。我长大了，我妈总跟我叨叨……

【评论】

“状告海关案” 跟进报道 (71)

——错别字通行的新时代

李南央（美）

前不久一位国内朋友发来电邮，大谈柳思如何、如何。我直纳闷他是怎么认识柳思伯伯的？所谈内容却同柳思根本就不搭界。云里雾里之间，突然拍脑猛醒：你真是在美国越呆越傻，人家不是在谈那个日子嘛！是的，那个日子这个月就是三十一年了！

第二天又收到一位朋友的电邮，他说：你发来的文件我都收到了。邮箱比微信安全，微信一不小心就会被封。为了能安全发出，大多用错别字。如：为吻=维稳，振腐=政府，赵国=中国，猫或任我行=毛某某，刁或东方不败=习某某；令尊的那句评某人变成了“猫病不改，积恶成刁”。

这种统治，逼得错别字成了通行字，如何得了！

我想起了整理父亲资料，看到高岗在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土地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不能用管农村办法来管工厂。分工没文化科学不行，硬碰硬不行。花园喂猪、花园砍树。文化知识水平很落后。

1948 年共产党大军南下之前，高岗说党的干部“文化知识水平很落后”，进了城，把花园里的树都砍了，在那里喂猪。七十二年后的今天，党的文化似乎比南下之前还不如了，它的前主席堂堂正正的“毛”姓，给砍了改成姓“猫”；它的现任主席堂堂正正的“习”姓，被猪队友认为必得改成姓“刁”，方可放行。真正是成何体统！

即使为了保留祖辈给后裔留下的姓氏，让姓毛的不要统统变成跟畜类同族，让姓习的不要统统变为跟刁民同宗，我现在举双手赞成台湾独立（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台独的）；我也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香港人的背后，支持他们将反对“港版国安法”的抗争进行到底。

我在这里重复一遍此篇引语框内父亲李锐二十年前说的话：“所以共产党从政治上讲，“六四”讲得难听一点，它政治上已寿终正寝！我可以做这么个结论。经济上进入 WTO，同全球化接轨，这个情况比苏联好一点。在政治上根

本不行。共产党就是相信它那一套专政嘛，而且硬要搞一个核心。这个不行！人类的历史是民主，每个人他都要发挥自己。”

在一个错别字通行的“新时代”，我须将“跟进”坚持地写下去，用正确的字写下去。因为我希望能够为这种“新时代”的早日消亡尽一份绵薄之力，否则我们的后代即便读到 PhD，也会以为毛病是猫病，学习是学习。■

【序跋】

《黑与红——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

楔子与后记

甄 皓

楔 子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经常在夜里重复地做一种奇怪的梦。

在梦中我竟然有腾云驾雾，悬浮在空中行走的能力。本来好好地走在街上，只要快走几步，脚掌朝地面一蹬，我就能缓缓地升到半空，高度大约在十几米到几十米的样子。我在自小生长的街巷上空穿梭，徘徊，透过一层薄雾俯览着地面街道上的芸芸众生，而他们似乎永远不会看到、也不会在意天上有一个人在行走。有时我的高度下降了，只要双脚在空中蹬两下，身体就会再次上升，有时身体飘向高耸的方形砖砌烟囱（欧式楼房壁炉的烟道）眼看要撞墙了，轻轻用手一推，身体就悠然飘离，继续飘向下一个街巷。

从空中俯览这个街区，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规整，而是呈现一片片斑驳陆离的杂色：砖红色，黑灰色，米黄色，叶绿色，等等，参差交错，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大块铁灰色，这是一个著名的室内广场的钢架屋顶，小学一年级时，这里举办过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工业展览会，当时作为小孩的我们反反复复进出展览会的大门，不是为了参观广场边高耸的橘红色塔吊起重机，而是为了多拿几次门口免费发放的精美书签和橘子软糖。再早两年新政权刚建立时，这里曾是公审和大规模枪决犯人的露天广场，我们曾看到一辆接一辆“飞行堡垒”（漆成大红色的囚车）转弯经过街

角那块“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巨幅铁皮宣传画，开进广场，囚车的驾驶室和后面封闭的车厢之间站着五个穿黄绿色军装的兵，中间一位在驾驶室的顶盖上架着一挺机关枪，十分严峻威武。囚车只有尾部上方有尺半见方的透气窗，可以看到车厢内靠窗的囚犯高举的双手抓住气窗上的铁栅，也可以听到车厢内传出的一阵阵绝望的嘶叫。作为小孩的我们朦胧地知道这些人都要去“死”了，而“死”是一件很恐怖很不好的事情。长大后我们才知道在看到那个场面之前的几个月，“飞行堡垒”正是后来失败的一方用来抓人杀人对付后来胜利的一方的，所谓“冤冤相报”说的大概就是这种轮回。再后来，这里建成的室内广场成了这个城市主要的文艺演出场所。曾经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这里参加课外劳动，不知怎的就爬到了室内广场的铁皮大屋顶上，又钻进了钢架屋顶下方为舞台打灯光的吊架上，从高处往下看，舞台上正在进行一场抗美援朝荣誉军人汇演，一群断臂缺手的残废军人把口琴绑在残肢上吹着名叫《真是乐死人》的轻快悠扬的曲子。打灯光的舞台工人对我们的降临大吃一惊又不好大声发作，只能压低嗓子警告我们：“爬上去！走出去！”而我们知道他忙着管灯光无暇驱赶我们，就赖着不走直到自己认为看够了表演后才遵命爬上去离开了广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广场成了各色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召开誓师大会，庆祝大会，批斗大会的主要会场。曾经有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音乐家被当作“老反革命”在这里接受全市电视直播的批斗，没料到这位老人家对伟大革命运动新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全盘否认，犟头倔脑，针锋相对，你批一句他驳一句，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很像他作曲的许多抗战歌曲的精神，成为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批斗者宁死不屈绝地反抗的少有绝唱。

广场斜对面隔着一条街，是一家三开门面的大食品店，店中的食品从糖果饼干到腊肉烧鹅到广东人爱吃的龙虱（一种形似蟑螂的黑色水生硬甲壳虫）无所不包。齐胸高的玻璃柜台里，有成人喜欢的蛋挞，南乳小凤饼，绿豆酥，伦敦糕等各式糕点，也有吸引小孩子的巧克力金币和用吉普车形的玻璃瓶装的丝光糖，每天傍晚，店里在沿街的橱窗里亮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门口摆起生煎酒酿饼的圆形锅灶，于是色香味的诱惑一并袭来，下班的人群走过这里很难不被吸引。但是就是这样一家五光十色的大食品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竟将素日的繁华甩得半点不剩，所有的玻璃橱窗柜台里统统

空空如也，只剩灰绿色的玻璃对着灰绿色的玻璃，后来在店堂深处的一个柜台里摆出了几块黑黝黝的蔬菜馅饼子，标价居然高达五毛钱一枚，据说是属于“回笼货币”的高档商品。

食品店的西头，是一家电影院，平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就是在这家“二轮影院”看的，以后则从50年代初的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一直看到60年代初描述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电影《昨天》《黎明》。电影院再往西，是一条名叫李子园的卵石路小巷，五十年代中这条弯曲的小巷里面散布着十多个以小学生为对象的小摊，所售商品琳琅满目：吃的有三分钱一包的盐炒豆，五分钱一只的油炸“苏联饼”，五颜六色的粽子糖，洒甘草粉的“金丝菜”；玩的有彩色的木制大刀长矛金箍棒，打红色火药纸的木头手枪，五分钱一大版的香烟牌子（上面有好几十张京剧脸谱或者连环画故事），转移印花纸，从孙悟空猪八戒到关云长的纸浆壳面具（儿童方言叫“丫乌里”）；活物有金鱼，蝌蚪，乌龟，蟋蟀，蚕宝宝，小白鼠……还有其他各种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玩意。所有商品价格都切合小学生的消费水平：竹弓钢丝锯只要五分钱一把，两毛钱一具的硬纸板做的幻灯机就算是高档商品了。小学时代因出生率膨胀学校教室不够用每天只上半天课，在同学家开课外小组做完课后，这里是我们流连忘返的乐园。

食品店往北，是一家乐器店，里面的墙壁和货架都刷成深蓝色，衬托着白色的钢琴，金光闪烁的小号长号萨克斯风，分外耀眼。到了文化革命的初期，不断有抄家处理或富人家主动抛出二手钢琴在这里出售，标价仅二三百元，还有乐器厂因市场萎缩成批处理的小提琴，仅三元至六元一把，但仍很少有人问津。

再往北，在公交无轨电车车站旁边，是一幢无人居住的别墅房，俯览着一片花园，周边围着一圈用黑色沥青刷过的竹篱笆墙。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竹篱笆墙被拆除，对着电车站的花园里竖起了一座近十米高的小高炉，24小时不间断地喷火轰鸣，穿着白帆布防护服的男女工人们紧张地加焦炭，堵风口，出铁水，看场面这是属于由正规钢铁厂抽调的熟练工人操作的“小洋群”炼铁炉。今天看来，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居民区公交站边建这样一个炼铁水的高炉，无论如何属于古今中外罕见的场面。“大炼钢铁”的热

潮过去之后，黑色的竹篱笆墙重新围住了这片空地，一个脸色忧郁的中年男子每天下午站在竹篱笆门前拉着一把油漆斑驳的小提琴，篱笆墙上挂着一块缝满小口袋的布帘，口袋里插着这个男子要出售的商品——钢板蜡纸刻印的歌谱，有《天涯歌女》《四季歌》《夜半歌声》等等，两分钱一张。某天下午，这个男子的布帘上方出现了一条巴掌宽的白纸条，上面用墨笔粗体字写着：“今日晚报新闻：当今美国大总统肯尼迪被一枪刺死！”这条新闻吸引了不少过路人驻足观看，让这个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主流的忧郁男子多卖出了几张歌纸。

我在天上继续漫步往北走，到了十字路口往东西两头便是菜市街，每天早上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人声鼎沸，显示着城市的生命活力。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肉类，豆制品都是定量凭证供应的，所以卖肉和豆腐豆干的摊位只有两三个，其余大多数摊位只卖蔬菜。大约在1953年前后，菜市场上还能见到用大木盆装的鲜活河鱼卖，后来便几乎绝迹了，直到1980年中期才重新出现卖活鱼的摊位。从空中的晨光薄雾望下去，我在熙熙攘攘的蓝灰色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穿桃红色棉袄罩衫的身影，那是我们小学的同学谷芳，家境贫寒却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因为她在全国普通话朗诵比赛中得过第一。此时她挎着竹编的菜篮在肉摊边排队，然后掏出一张肉票用两毛钱买了一片肉，那年头做大碗的红烧肉是罕见的奢侈，把一片肉细细地切成肉丝炒咸菜或其他蔬菜才是普通人家常用的烹饪方式。1958年大跃进之初，菜市街两边的许多街坊围墙被拆除，一些居民房被破墙改建成了公共食堂，因为盛传即将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大家都在热议哪家电影院哪家理发店将划归哪个公社，作为小学生的我们甚至听说父母都要分别住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过军事化革命化生活，星期天才能回家照顾孩子，幸好后来党刊《支部生活》刊登了辟谣启事说解散家庭只是部分群众的猜想并无实施计划，大家才稍微安心。但居民公共食堂倒是存续了好几年，食堂供应饭菜的窗口边挂的小黑板上通常用粉笔分三个栏目写着各种菜名，甲菜一角五分，乙菜一角，丙菜五分。甲菜通常有肉，乙菜往往含豆制品，丙菜则是纯素菜。后来有一段时间，甲菜栏下一直空空如也，乙菜栏下却出现了一道叫“人造肉”的菜式，它是用一块冬瓜粘了面糊在锅里煎一下，然后加酱油略煮生成的食物，除了眯起眼睛用模糊的视觉去看觉得它还像一块肉可以骗骗自己饥肠辘辘的食

欲，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再后来食物越来越匮乏，人越来越饥饿，每天上午上到第三节课（一共四节）肚子就叽叽咕咕乱叫，中午匆匆回家把食堂打来的米饭用开水加胡萝卜丁加青菜皮煮成菜泡饭，这样一碗米饭（四两）可以涨成三四碗，能够撑满胃囊勉强抵御饥饿的感觉，幸好这样严峻的状况只维持了一年多，到1962年便完全缓解了。

从菜市街的尽头再往东南走，是一家著名的前教会医院，初中时曾在这家医院的后院参加课外劳动，整个下午坐在露天的阳光下用瓶刷不停地清洗各种玻璃药瓶。院子的左手是太平间，据说里面的水池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很多死尸，我们没敢进去看。右手边则是一排每间房间都有两道铁栅栏门的平房，据说是旧社会关押治疗江洋大盗重要人犯的特殊病房。从医院的前门出去，正对着一条幽静的小街，中间一段是四层高的排屋，秋天的阳光把婆娑的树影打在米色的外墙上，令人倍感温馨，这里住着我的初中同桌贝蒂，一个工程师家庭出身的文静女孩。那年代同班的男生女生基本互不讲话，但我和这位同桌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可笑默契，就是碰到语文政治考试测验经常互相偷看抄袭对方答案，而碰到数理化考试测验则绝对凭真本事去对付。

从菜市街东头往南，是一条英式三层排屋的弄堂，每个单元深棕色的木门上有直径一米多的圆形栅格玻璃窗，推门入内，楼梯间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幅年久发黄或带水渍的铜版画饰品，内容大多是十八世纪欧洲田园生活的场景。好几位小学和初中的同学都住在这条弄堂，小学时还曾在这里一个同学家开过课外小组，五六个同学一起做作业，做完了就在楼下院子里种蓖麻向日葵（收获的蓖麻籽上缴学校据说可以为解放军叔叔的飞机制造润滑油），或者用弹弓打隔壁院子大树上的麻雀，虽然没有一只麻雀被我们击落，但大家仍觉得那些日子真是如天堂般的无忧无虑十分快活。唯一有点不祥的是后来听说住在这个同学隔壁的一位小姐姐因为思想一贯反动文化革命中被拉到飞机场去枪毙了，正好被同一条弄堂的一个小妹妹撞见后回来告诉了大家，听说后来人民警察还上门向她妈妈收取了一角五分的子弹费。在那个年代也许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手续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你思想如此反动，结果不得不浪费人民的财产来枪毙你，当然是应该由家属做出事后补偿的。

从这条弄堂往西隔条马路，是十几幢夹杂着绿树和草坪的北欧风格的公寓楼，从一个窗口可以看到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同窗的小昊，正在拿着画板

画窗外的风景——早晨的阳光照在红砖和米黄色拉毛墙面构成的暖色块上，显得格外亮丽。小昊的父亲据说解放前是一名记者和编辑，抗日战争时跟随战事采访从江南撤退到武汉再到重庆，49年后进入本城的大学教书，57年时遭遇到大家都知道的那场运动的整肃，地位一落千丈，但少年小昊自学美术的水平却从那时起节节上升，后来成了中学学生会不可缺少的宣传骨干，学校参加反美示威游行抬的大幅宣传画，从越南民兵群像到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的炭笔素描巨幅头像，大多是小昊的作品。这片公寓楼的租客，原来大多数是外国籍居民，在这里居住了十几年，连他们的小孩都会说一口洋腔洋调的本地方言了，但后来却无法适应五十年代初的社会变动，陆续回国了，剩下的租客多数是工商界的富人和文教界艺术界的上层文化人。在公寓楼的西南角，有两排长长的平房，那本是公寓附属的汽车间，国共内战的末期，大批山东苏北的难民（当然也可能混有后来查出来的逃亡地主）为躲避饥荒和战乱涌进城市占住了这两排汽车间，慢慢地变成了这里的正式居民。这些人后来习惯把前面豪华体面的公寓楼简称为“大房子”，而把自己居住的简陋无窗的汽车间称为“小房子”。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住在“大房子”中的富人渐渐失去了原来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和闲散倨傲的富人气势，而住在憋屈的“小房子”里的穷人尤其是他们的孩子们却慢慢地获得了一种“领导阶级”蔑视“资产阶级”的戾气，小房子的孩子在居民区里踢球砸破了大房子人家的玻璃窗，从来不觉得需要道歉赔偿，而是理直气壮地去敲门讨回飞入人家房间的足球。大房子和小房子之间的阶级对立情绪就这样一直隐隐地存在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完全扯开脸皮，那时小房子里七八岁的男孩也能充当带路党，热心地为各种杂牌红卫兵组织提供抄家打劫所需要的大房子人家的敌情——“这家人是反革命”，“这家人是大资本家，已经抄过两次的”，看到大房子里的富人们被抄被劫，小房子的少年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再次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感觉。

我在梦里的空中行走似乎从来没有越出自己家附近的街巷上空，而实际上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对整个城市的街道和交通都了若指掌，无处不可达。当我还是一个囊中羞涩的四年级小学生时，就曾只花一毛钱做过贯穿城市的旅行，从西区的家里出发往东徒步，穿过市中心的广场，来到把城市划成东西两块的两江，花六分钱买一张轮渡往返票乘船到江对岸，然后花三分钱买门

票进入东岸的滨江公园，在公园里消磨一个下午，最后乘轮渡返回西岸，在江边的小茶摊（通常仅是一张木凳摆了五六杯茶水）花完最后的一分钱买一杯水解渴，然后再一路往西步行五公里回家。那时的东岸滨江公园完全是一幅野外的景象，周围没有一座楼房，人迹罕至，走进江边的树林，脚下是多年积成的厚厚一层枯叶，干燥而温暖，你尽可以在这里脱光衣服趴在柔软的树叶上，让穿过树冠的一束阳光为你做个日光浴，而不会有人来打扰，一切城市的喧闹都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能听到间歇的蝉鸣，听到远处江水拍打堤岸的涛声，听到江面上偶尔传来闷哑的轮船汽笛声和对岸海关大楼报时的苍凉钟声，除此之外，只有乡间午后的静谧。成年后走过国内外许多文化名城，懂得了所有的城市文明大都是傍着一条河开始发生发展的，今天，这片滨江区已经发展成摩天大楼比踵而立，高架路和地铁隧道交相穿越的中央金融商务区了，你再也没有可能在这里的任何一个露天角落脱光衣服躺下晒日光浴了，那一片江边的空旷和宁静，永远地消失了，只能存在于当年一个少年的回忆中而已。

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经常做空中行走的梦，只是心脏功能不好的一种症状；也有人说，这是白天心理负担过重异于常人产生的一种睡眠现象，我不知哪种说法正确或者都有道理，但是当年梦中的那种感受，那种心境，却始终刻骨铭心：我在高空行走，看着下面的不断前行的人流，但没有人看到我，也没有人在意我，我渴望降到他们当中去，拥抱他们，我想和他们进行灵魂深处的实质性对话，探讨人生哲理，探讨国家大事，社会现实，探讨人类的性压抑性困惑……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理会一个空中飞人，他们只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地前行，像拥挤的菜市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推着自行车，挎着菜篮子，提着书包，戴着红袖章，甚至戴着藤条帽，提着“文攻武卫”的长矛……不断地走，不断地走，汇成滚滚洪流。我其实无法降落到他们中间去，我只是在空中徘徊，飘荡，那种清冷，孤寂的苦涩，和自以为洞察一切，自由自在的甜蜜，始终纠缠在一起，终于成了永久的记忆。

后 记

我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1948年6月，国民党政权已临近风雨飘摇败象毕露的日子，却还在一本正经地“实行宪

政”，要给全国老百姓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那时的规定也和大陆1984年才开始实行的“居民身份证”一样是“十六岁以上必领，十六岁以下可由有监护人代领”。我父亲当时肯定是出于“留此为证”的戏谑心理，帮我也办了一份，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用印钞纸印制的身份证的样子，上面有我一周岁的照片，注有“XX区XX保XX甲”的字样，周围有一版一百多枚购物证小票（Coupon），大约是用来供应配给米或其他物资用以限制“匪谍”活动的。但是这样的印刷品纸片片如在文革抄家中被发现肯定会被当作怀念旧社会的“变天账”罪证，因此被及时撕成碎片冲进下水道了。看来我们这一代人，要经历“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经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记事较早，因为1950年前后国民党军机从舟山岛骚扰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时，家里窗玻璃上贴满白色交叉纸条，探照灯在夜空中四处摇曳，听到警报声全家人熄灯躲进一个充当防空洞的小储藏室的情景，在我脑海中都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夜间做噩梦发现妖怪爬到我窗口，那妖怪的形象竟然是穿条纹裤和燕尾服，头戴高礼帽下巴蓄着一撮山羊胡子的外国人，不用说那是当时政治漫画中由“山姆大叔”演化为“凶恶美帝”的标准形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我的小学的附近有一家少年儿童阅览室，小学三四年级时课余经常到那里去看书，办了借书证就可以在阅览室里借阅各种图书，而多数人基本上是只看连环画，那是用四五本连环画装订在一起的一厚本，看完一本再去换第二本。五十年代中期的连环画比较有品位，不但绘画有很好的美术水准，而且取材大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我一个小学生就沉迷在那些“小人书”里，现在还有印象的连环画书名有莫里哀的《吝啬鬼》，契科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警察和赞美诗》，电影连环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还有一本水墨画的《人与狼》，记得是讲意大利两家山村猎户之间的爱恨情仇，穿插了人性和狼性的描述对比，印象很深，可惜现在网上已经查不到这本小说原作和作者的相关信息了。人到晚年回忆起来，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人文启蒙竟然是靠看这些“小人书”完成的，很有点“师出无门”的羞愧感觉。

小学四年级时我在那个阅览室看了一本连环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一方面深深地为其故事吸引，一方面又觉得我自己也能写一本差不多的书，于是在一本大方格作文本上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创作，记得开头大约是这样写的：“一个温暖的春天下午，老航海家史密斯正坐在屋里窗旁喝咖啡，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好朋友彼得，彼得兴冲冲地说，我最近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到南极去航海探险，史密斯很高兴地说，好啊，我也正有这样的打算呢，于是他们两人……”可惜的是我在作文本上写到第五页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儿时雄心勃勃的写作梦就此早早夭折，虽然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的一篇作文罕见地得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好评，但那次好评并没有再次激起我对写作的向往。那篇作文写的是参观农业展览会的观后感，讲到我看到一台为竹编制作原料的劈竹蔑的机器，能麻利地把竹子劈成细条，我在结尾写道：“而我看到的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污蔑，随着这台劈蔑机的轰轰作响，被劈得粉碎了。”班主任老太太用蘸红墨水的钢笔在作文本上写了长达半页的好评，说是“……有事实有评论，用亲身经历批驳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谰言，好！好！！好！！！”老太太写得很激动，在最后一个好字后面溅落了一大滴红墨水。但是我知道，这个好评与作文写得好坏关系不大，关键的是那时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否则就有麻烦。其实“右倾机会主义”对一个小孩来说完全是个莫名其妙的词汇，就像“油琴鸡烩主意”差不多。

到了退休后多年，当生活逐渐安定，为稻粱谋的奔波已经停歇后，人生中最动荡又是最有思想的青年时代所积压下来的思绪，忽然又涌上心头，形成了强烈的自我表达的热望。经过前后几年断断续续的手书草稿和敲击键盘，已在电脑里存下了一些零散的“码字练习”，有赖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提供闭门不出的大段时间，终于把这些零散作文集结成了这本“四不像”的东西。自认没有文学天赋，缺乏专业训练，学养浅薄，但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都有独特的价值，又相信自我表达是天赋人权，所以还是认真地爬完格子并不揣冒昧把它公之于众。章诒和先生说过：“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受这段话的鼓舞，希望自己的这本小书，也能成为共同历史记忆中的一砖一瓦，它是对

自己青年时代的真诚纪念，也是留给我们的后辈探寻前辈心路历程的参考。

父母一辈人的 Highlight 是他们的青年时期，那时正逢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意气风发地高唱“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洪波曲》，田汉词，张曙曲），用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热诚和贡献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历史。而我们这一代人的 Highlight，很可惜只能是中国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被党的领导层定义为“十年浩劫”和“十年动乱”，近年又被改称为“艰辛探索”，成为党的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预料今后对其性质定义还会有或明或暗的反复争论和长期拉锯战），这十年的社会动荡恰逢我们的青年时代，正是观察社会，形成世界观的时期。那是一个集中暴露各种社会矛盾的断层年代，它和之前之后的年代大不相同，又和之前之后的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那是一个暴力肮脏愚昧封闭令人窒息的年代，但其中也镶嵌着一些纯真的理想主义，也包含着一些清醒的勇敢的反抗，它也教会了我们许多在平常年代体验不到的东西。

我们是从小就接受洗脑式教育的一代，心灵深处的某些扭曲难以完全平复，眼界和格局都会受到过去时代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客观地正确地叙述自己所处的年代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噩梦中走出来的亲历者，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那个世界有比一般人更清醒的认知。从“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角度，无论怎样的个人表达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所以自己还是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包括自己的惰性）写下了这篇真实年代虚构人事的“叙事”，说是“虚构”，却大都是“事出有因”，也有历史轨迹可寻——1968年某月某日在某路口抛锚的中型吉普车上的大学生青年若还健在，能看到本书第18章，必然知道那写的就是他们自己。但个人际遇只是一滴水珠，无数的水珠汇成了真实历史的浩瀚大海，具体个人的对号入座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对于文中的“真”和“假”，还是那句老话“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读者自可凭各人的经历智慧良知去体会。

文革中的语境既封闭保守畸形又随着政治风云瞬息变幻，这些都力求在写作中得到体现。文中的叙事，有的展现的是当年的思维方式和语境，有的体现了数年后的反思，有的则已经包含了数十年后互联网跨越高墙后得到的

新资讯新视角和新认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视角不同心境的叙事有时交错地排列在一起，但绝不应该不分时空不分历史环境混为一谈。《颠倒岁月》（2012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徐小棣在后记中说“以近年来的认识和心境去还原几十年前的场景，想必难免存在重构和偏差”，说得完全在理，在观念和语境已经变化的今天，作者已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对基本史实的“重构和偏差”，相信聪明的读者，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分辨体会文中的时代落差，在此先谢谢因彼此缘分读到本书的读者。

文革从本质上来讲是“山寨内讧，祸国殃民”，当林彪事件爆发，文革的荒谬已经一览无余时，我曾经预想将来会有千百部如同《战争与和平》一般的史诗巨著来回顾解析这个风云跌宕充满戏剧化政治斗争的时代，这个充满民族惨痛教训的荒唐耻辱的时代，但是，由于上层眼前的政治需要，结果竟然几乎没有。有些作品用图案化，寓言化的风格来写文革，无法触及其本质，其效果和全景油画或大型交响诗般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法相比，终究显得大题小做，隔靴搔痒。文学批评家们所说的“把缺失当作强项，奉行躲避崇高策略，鄙视宏大叙事，消解终极追问”成为文学和出版的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觉得文革长篇小说《迷冬》（三部曲之一）等少量作品的可贵，也和作为同代人的《迷冬》作者胡发云先生痛心于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如此萧疏有强烈的共鸣。

平民百姓，写作不易，寻求出版更难，神州大陆自不必说，向海峡对岸十几家出版社寻求机会包括自费出版，也基本上全无回应，不得已只能先从亚马逊 KDP 网络自助出版寻找突破。在困顿过程中，曾有幸得到胡发云先生的鼓励和指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发现美国华忆出版社并出版这本书，绝对是一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体验。当历尽挫折自己对出书几乎已不抱希望时，却在 Youtube 平台的一则视频中偶然发现了美国华忆出版社的名字，去网上一搜，意外地发觉她的宗旨和出版方向正是自己孜孜以求的。3月15日将文稿发电邮去征询，次日即收到“可以出版”的肯定答复。有赖编辑乔晞华先生的学术修养，专业精神和耐心细致地与我沟通，这本书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校对排版，终于在大洋彼岸获得了“出生证”（ISBN）顺利出版付印。

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正值俄乌战争炮声隆隆硝烟滚滚，而国际大都市上海正经历封城抗疫的空前沉寂，历史的巨人正用怜悯的目光，俯视着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和命运再次被推入荒谬的困境并经历惨烈的考验，一如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断层年代”。

感谢美国华忆出版社！

【怀人】

王若水先生二三事

刘若

第一次见到王若水

1995年秋孙蓬一去世，在八宝山公墓遗体告别，来了很多人，有文革中支持他的，也有反对过他的，孙蓬一的生前好友络绎不绝。出乎意料王若水也来了，许多人围着他问长问短。

王若水，尽人皆知。他写的关于《桌子的哲学》早年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在文革中由于他给毛主席的信，得罪了“四人帮”以及毛。

王若水访美回国后写的文章深刻而有趣，尤其是对美国人的幽默令我感到很好奇。并从此开始思考这个被我们一直视为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此外他与冯媛的婚姻，感觉就像是海外奇谈。

送材料

孙蓬一夫人柴树园对我说王若水想要些材料。

因为孙蓬一生前多年被批判、挨整、抄家、关押，有些书籍、资料存放到我这里。不知道王若水要哪方面的，我提了一堆去他家，让他自己挑选，他还给我写了个回单。

王若水家在人民日报社内，进了报社要走很长的路。他住在5层楼上，一进屋感觉到处都是书。另外厕所里的水管子不只一处漏水。傍晚冯媛回来，一定留我共进晚餐。饭桌就放在狭窄的门厅。没想到原《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国际知名学者的住房竟是如此！

为聂元梓回忆录写序

聂元梓用几年时间写了近40万字的回忆录。考虑再三，决定送王若水看看，并希望他给写序。当时王若水很忙，手头有好几个题目要做，不过还是同意先看看稿子。并且因为聂元梓已近八十，他便专程到聂元梓处取原稿，序言写完又亲自送回。

两周后，王若水告诉聂元梓，他改过的有四个字需要再更改。

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给王若水送材料时谈起文革，他送我一份他写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当时我草草看过便立即表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得很强烈，用词也很不讲究。而王若水并没有生气，只是说可以各持己见，而且始终态度很温和。

原《人民日报》理论组胡志仁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愤，严厉责怪我没大没小，说：“你有多少见识？只是大、小字报上了解点事儿，再就是听些小道消息。而王若水是他个人的切身体会；并且就其阅历、资质、理论水平以及作学问的严谨态度，王若水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其实不用他说，我自己回来仔细看过文章后，已经十分后悔自己的莽撞。我给王若水写了封信认错。

王老师：您好！寄去我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的野心》。这表明我已经投降。您经历了几十年痛苦转变过程，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光就投诚了，这是因为您的文章说服力太强！

我想，您一定觉得好笑，一个如此孤陋寡闻，无知幼稚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或者说是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居然和我讨论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

我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十分内疚，但同时也感到兴奋，因为没有这种天真无邪，绝不会有如此地唐突。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样不礼貌地打搅会对您健康不利。那天我见到您，一点没有您生病的感觉，而且似乎您精力很充沛，所以才会那么不知深浅，疏忽大意。请您宽大为怀，我会去府上负荆请罪。再见！

不久我去他家。感觉王若水一点也没在意，我便把自己写的些东西拿给他看。后来他说对于描写性的小说没有时间仔细看，不过他和冯媛都看了我写的

杂文，说其中《母亲节》写得不错。我非常感动。因为那篇文章与政治、哲学、文革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体验。

在重提文革时我依然坦白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不完全同意的原因，我希望人们在批判毛泽东时，以一个悲剧人物笔法去写。王若水说：“不是那么简单，悲剧人物不能概括毛泽东。”接着又说：“周恩来才是悲剧人物。”他还提到现在国外把周总理写得很坏是错误的。

后来他给我看了他写的《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我边看边流泪。因为在事发当年，孙蓬一生前就和我议论过，认为王若水太书生气。他给毛泽东的信客观上等于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毛泽东肯定是支持文革派的，而王若水本意恰恰相反。王若水为给周总理带来的不利而深感歉意，并以一个亲历者不厌其烦地讲述，写出事情的原委，其详细程度，谈话语气都能把人带到那个年代，其态度诚恳令人感动。

1999年《百年潮》杂志上刊登了他题为《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文章。我看后给他去电话说：“看了此文才感觉到您的工作量。”接着我又不识时务，或者不无调侃地提道：“毛泽东早年说过，现在理论文章太少，希望能够看到好的理论作品。不知道毛泽东在世的话，看了您的这篇文章将是如何的评价。嘻嘻！”我这么说，王若水竟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他告诉我《百年潮》是从香港某杂志上节选的。后来，他把他的那篇文章的全文打印了一份给我。

未成行的博导

王若水身患癌症，多次做手术。但是看上去精神很好，每次他都一直把我送到报社门口。谈到他的病他总是轻描淡写，不过似乎心中有数。他说：“死倒不怕，只是许多要写的文章没有写完。”我也不知深浅地说：“那就抓紧时间写或找个助手吧。”他说：“要看许多书还要查资料，时间太紧迫。”他经常自己从城东金台路，跑到城西国家图书馆去借书或查阅资料。为了真正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搞清楚，还要自学德文，因为他觉得目前国内许多翻译是从德文翻译成英文或俄文，再译成中文的，其中有许多走了样。他是在不断地提取自己生命中的内存，争取在生命结束前榨干。

为此我提出一个建议，即给他招募博士生，他做博导。这样可以让他

士生帮他收集材料、翻译文章、协助写作。他说：“现在都不让我进大学讲课，还谈什么博导！”我说是没有名分、没有文凭的博士与博导。而且我找的这位“博士生”是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基础扎实的北京大学教师印红标。王若水看过他的文章，表示同意。但是终因阴差阳错没能成行。假如这件事早些年着手的话，王若水生前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而且他活得也会轻松些，为此大家都很惋惜。

王若水走了，从第一次见到他以及以后的每次见面就知道他快要走了。在他真的走了以后，人们感到的伤痛是巨大的。他带着沉重的思考、待解的课题、深深地遗憾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位有真才实学、可亲可敬的理论家。■

【述往】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

吴忠

尼克松访华是我国一件大事，总理召集我们搞接待工作的人，有好几十人，总理讲，美国是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头，尼克松是帝国主义的头，帝国主义是反共的，所以他是国际上反共的头子，本着什么指导思想接待？总理开始讲形势，讲接待工作如何重要，后来明确讲本着什么精神做好准备，做好接待工作。

总理讲，接待工作要不卑不亢，不要奴颜婢膝，一副奴才相；但也不要盛气凌人。总理提出的指导思想很重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品德。安全工作由解放军负责，包括陆海空军；尼克松的飞机经过上海到北京，怕蒋介石在这一段干扰、破坏，有空中安全问题，由空军负责；到北京，解放军就是指卫戍区，总理讲，北京就由卫戍区负责安全。

总理在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外交部汇报。乔冠华、韩念龙、王海容、姬鹏飞等参加，乔冠华汇报。他是外交家，讲我们刚欢送走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理布托，现在又要接待美国总统；美国还霸占着我们的台湾，不算友好国家，要以示区别；为了以示区别，具体说就是：机场不通知外国使节欢迎，也不组织

群众到机场欢迎，只检阅三军仪仗队，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晚上的国宴，不挂两国国旗，也不奏两国国歌，以示区别。他讲时，总理在批阅文件，总理说，这样做，总觉得我们吃亏了；国宴不挂国旗、不奏国歌，尼克松的告别宴会也不会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除此他再没机会了，这样我们就吃亏了；不通知外国使节到机场欢迎，也不组织群众欢迎，不是已经“以示区别”了吗？总理不是指责外交部不对，完全是研究、商议，外交部同意总理的意见。

尼克松去的地方，要照相、摄影，让不让？总理说，你只要让他去，就要让他摄影。总理讲得好，只让参观，不准照相，不是显得很气嘛？总理考虑很周到。总理很注意宴会的菜，主要的菜是总理点的，选最好的厨师做。比如总理点了鱼翅、椰子鸡，还有好几个菜是总理点的。宴会上演奏的音乐由军乐团演奏，总理审查的很细，我们都跟着总理听。演奏的时候，总理让减少一个小提琴，再听，又让减少一个小号；减少什么乐器，增加什么乐器，总理不仅审查什么乐曲健康，连配器都管。好像是这一次，他问贾世骏的情况³⁶，有关人员说贾世骏没出来，还没解放，他说，贾世骏有什么问题？应该解放。贾世骏从此以后就出来了（唱歌的，男高音，是北京军区文工团的）。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访华是北京最冷的时候，这一年北京下雪很大，我们准备了大半年了，下雪怎么办？总理布置后，我去找北京革委会管公交的陈尔东（音），让他从长春汽车厂订一百台解放牌车体，改造成扫雪车，很快就落实了。果然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下了大雪，正好是预定去八达岭参观的那天。³⁷

开始，有一台美国电视转播车上了八达岭，接着就下大雪，约有30公分厚。总理考虑下雪路滑，路上还有冰，汽车不安全，准备坐火车到青龙桥，再步行上八达岭；第二方案是坐直升飞机。总理打电话到处找我，我那时在钓鱼台到八达岭的路上来回跑，检查。总理找我，吴德找，杨德中也找，总理让杨德中找我，采石场不在，八达岭也不在，我在十三陵。因为尼克松参观八达岭后要参观定陵，也有道路问题。总理问我对这两个方案的意见，我说坐火车从青龙桥要走好几公里；坐直升飞机第一不安全，第二容量小，一架才能坐几个人；还是坐汽车好。总理问，坐汽车，路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总理问安

³⁶ 贾世骏(1930—2011.9)，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文革中曾被停止演出。

³⁷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一行按预定计划参观八达岭长城；但一夜大雪厚达30厘米，而尼克松驱车赴长城时却一路都很干净，至今都在流传是北京市动员了八十万人连夜扫雪，吴忠道出真相。

排，我说分三段完成，从钓鱼台到北环路进入昌平的路口是第一段，第二段到采石场，进入山路，第三段到八达岭；工序分四道，第一道工序用推土机把公路上的浮雪推到两边，第二道工序用扫雪车把剩下铺在冰上的雪扫掉，第三道工序用喷洒车喷洒25%的盐水，准备了150吨，喷洒盐水后路面上的薄冰就变成颗粒了，第四道工序再用扫雪车把颗粒扫掉，这样公路上即使有雪，也没有冰了，车辆可以正常行驶。总理问有把握吗？我说要求八点前完成，有把握。总理说就这样定了，坐汽车去。总理电话问了很多，找李震公安部长，也在路上跑，管安全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后来吴德找到我，他怕我吹牛，怕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没问题，我计算好了。第二天天亮以前都完成了，我去检查，路上车没有，人也没有，车都回到指定位置了，我就在昌平附近指挥所睡觉了。八点钟看到车队过去，我也没上八达岭，卫戍区管安全的邱巍高、曾绍东去了。我一夜没睡觉，太累了。

这条路，美国人很惊讶，怎么搞的？头天大雪，第二天公路上干干净净，既没雪也没冰，速度怎么这样快？用的什么方法？第二天尼克松参观的心情很好，总理也非常高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计算好以后，有把握就说有把握，没把握就说没把握；打仗搞惯了，领导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经过总理纠正，国宴上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尼克松的告别宴会也奏两国国歌、挂两国国旗。

到机场欢迎尼克松时，印象中穿军衣的就我一个。很多人问，尼克松走到我面前那样长时间，说了很多话，说什么了？翻译告诉我，他很赞赏我们的仪仗队，训练好，很有素质。

宴会上的音乐，尼克松很满意，演奏的好；美国的民歌，有一首曲子听着很熟悉，很好听，配器也很好，我问同桌的黑格，他说是“雄伟的亚美利加”³⁸，演出的节奏比较慢，非常好听。

尼克松走时组织了群众到机场欢送，因为谈判很有成就。

这次尼克松访华，毛主席的战略考虑很高，非常英明。尼克松是帝国主义的头子，不是我们去美国，而是他到北京来，本身就表明是他有求于我。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尼克松急急忙忙、非常高兴地进中南海拜见共产党的头子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革命和反革命的两巨头，更显示战略上是他有求于我。

³⁸ 此处吴忠记忆有误，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演奏的美国民歌是尼克松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

这样一来，世界形势马上就变了，紧接着就是田中访华³⁹。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就不存在了，很多追随美国的也都和我们建交了，从此解冻了。我想，主席也是主张开放的，当然很难说是不是现在这样的开放，但他不主张闭关自守。尼克松访华的过程大家都知道，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传话，通过记者斯诺给尼克松传话：“可以秘密来，也可以公开来，坐上飞机就来了嘛！”后来基辛格就来了。所以这一着很高明。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形象很高大。☛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四）

杜钧福

十六

1967年5、6两月，我是在四川度过的。为什么去四川，说来话长。

四川“二月镇反”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正打内战，并不知情。那个时期，各地造反派受镇压的消息不断传来。第一项这样的消息大概是66年12月份的新疆石河子事件。过了年，粟达人到黑龙江鸡西探亲，介入了那儿的运动，回来后，向我介绍当地造反派受迫害的情况。我还和他一起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过情况。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当然毫无保留同情各地的造反派。

4月份，我所有人请了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人，其一是北工大的王定之，来我所报告国内形势。他大概去过四川，很生动地描述四川“二月镇反”的情况。如飞机如何在全川撒中央军委传单，解放军如何抓人，如何用背铐，监狱如何人满为患。我们当时对此是闻所未闻，听了后义愤填膺。这时期，院里还请了刘结挺张西挺来作报告。

5月初，我所请了成都“826”政委江海云来作报告。来的还一个中826冯斗，也是个女学生。会场气氛非常热烈。报告完，我们很多人送她们到住地西苑大旅社。不但我们，所里绝大多数人都很支持她们，认为她们是真革命。

³⁹ 尼克松此次访华后的1972年9月25日至30日，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这时候，我从什么地方翻出了几张院红卫兵司令部在二月份印的传单，是站在当时官方立场反“826”的。这个司令部在内战中是站在造反派立场的。我把这几张传单贴在所门口，用以揭发造反派的保守立场。但这时候他们已转变了，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我们。刘张可能就是他们请来的。

在这之前，我曾在城里看到以红联名义写的支持四川造反派的大标语。我很奇怪是什么人写的。后来才知是数学所一些人写的。他们很早就去四川活动，不仅是支持“826”，而且介入很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56事件，成都保守派产业军在132厂开枪，打死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和其他好些红卫兵。数学所的人当时也在场。这个爆炸性消息传来，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马上飞到四川，和那儿的造反派战友并肩战斗。

正好，院里组织代表团赴川。事后知道，是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他们的心情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支持造反派。我知道了这个信，马上到革委会找陈肖兰，要求派我去。后来革委会开会讨论同意了。因为我当时不是什么头头，去不去没什么关系。所里又派了二室的李德忠和张效昌。去之前，每个人都签订了生死文书，去了以后不管死伤都自己负责。

但问题是大家都想去。特别是《风雷激》的几个人，执意要去，革委会当然不会同意，他们就想偷偷去。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但这事，我前思后想总觉得不妥。无论从他们本身利益，从我们造反派利益，从所里的纪律性来说，他们都不应该去，特别是其中还有所级的领导。我就到所革委会去谈我的看法。正好他们正在开会。他们当然同意我的看法，并让我向这几个人传达革委会的意见，即叫他们回来。于是我赶快进城找他们，因为他们已进城。他们听了我的话，明显表示不同意。其中王昌衡把我大骂一顿，说我背后搞鬼。

既然拦他们不住，我们就一车去了四川。李德忠也去了。张效昌没去，因为所里后来连我们三人也不同意派了。《风雷激》这次去四川，在所里影响确实非常不好，败坏了造反派的名声，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5月11日我们到了成都。可能车上有不少没票的人，所有826派的人排上队，不是从检票口，而是从另一个门，喊着口号，集体出站，当然也没检票。我们也随着这个队伍出去了，虽然我们有票。

一出站，就眼界大开，看到一队队带柳条帽、手执长矛的人押着几辆卡

车。车上的男女都高举双手。原来是押送对立派的俘虏。

我们到了华西坝。这儿有中科院成都分院的几个所。数学所的几个人住在这儿。他们向我们介绍了56事件的经过。当时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

当时北京红代会组织一个56事件调查组，我们分到一个名额，具体派我去。当时给了我一个小红布胸章，派了一辆车送我到西郊的132厂。132厂是一个很大的国防工厂。56事件后，保守派的工人都撤到农村，这厂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119分团掌权。全成都都是这样。我找到调查组的一个人，他分派我参加调查百货大楼事件。这也是一个武斗事件，发生在开枪之前。我接受这任务后，去百货大楼看了看，发现整个厂子太乱，谁也找不着。最后调查组本身也没有了。我在他们工人宿舍住了一宿，只好回城。

我们红联的人和红卫兵司令部的人原本都住在华西坝。后来，成都分院的人和司令部的人吵了一架。本来司令部的人也支持826，可打算把所有从北京来的人都归他们统一指挥。这边的人当然不干，说我们已开展很长时间工作了。他们一气之下搬到了市中心的分院院部。我算他们一部分，也就跟着搬去了，但他们也没分配我什么正经事干，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这一段时期，成都特别紧张。街上大字报天天报道外地武斗消息。说宜宾14日开始的事件，已死200余人。乐山也在告急。传说产业军正在准备进攻成都。于是，成都一片备战气氛。一卡车一卡车的人来回调动。中826手持木棒巡逻。老人扛着铁棍站岗。十来岁的小826威严地下命令，叫来往车辆停下，关发动机检查。整个形势如同想象中的巴黎公社处于凡尔赛进攻之前。

5月19日又发生中和场事件。据说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四川大学的826学生到郊区的中和场那个地方去帮助农民夏收，被产业军掠走很多人，别的学生去援助，于是发生武斗，而且越斗越大。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红卫兵司令部的领导发命令，每人找一根铁棒就乘车去了。谁也不干落后，怕别人说你怕死，再说我们来这儿就是为的这个。我拿的是一根一米长的铁管。

“在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一“林彪语录”当时广为传播，后来成为“414战歌”。我想，要真上战场，可能真要这样想才对，不能瞻前顾后。否则死得更快。

找一辆卡车，往东南方向开，到了九眼桥，就看到紧张局势：人挤得很多。车子来回奔驰。救护车载着伤员往回开。伤员满头鲜血，缠满绷带。一卡车一卡车的参战人员举着红旗往前开。

车子到了现场。这里的公路上挤满了人。一辆北京红代会的宣传车作为指挥车，大喇叭在喊。但人们缺乏组织，极乱。看到对面山上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些人，说这就是产业军。我们这边就往前赶。因为是水田，很难走。但了前面，产业军就撤退了。于是这边又追。追到一条河边，双方更接近了。对方沿河撤退，退到一个大桥旁边，停住了，用石头还击。这边没有石头，只好撤退，退到一个有石头的河滩地方站住脚。双方就僵持住了。在这进退过程中，双方都有人被对方俘虏过去。

这样一直对持到天快黑。只是有些小接触。因为天黑后再不撤就会吃亏，所以这边就慢慢撤，一直撤到公路。到夜里十点多十一点，开来一队不带武器的解放军，把双方隔开，并由这边的826、川棉战斗师、公安公社掩护，才逐渐全撤了。撤完大约夜十二时。这就是中和场事件。当天我就近住到了华西坝，没回院部那边。一起去的人早就分散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武斗现场。我感觉至少这边毫无组织，若真打起来肯定吃亏。另外，看到不少小孩子参与其间，更觉荒唐。在双方经常公布的“烈士”名单中，几乎一半是十几岁的少年，甚至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年纪小体力弱，更易被屠杀。后来我在重庆看到的也是一样。

次日，在火车南站又发生武斗，一直打到下午。也是由解放军隔开的。据说那边还打了解放军。当天晚上，风声鹤唳，说产业军要攻城，形势极为紧张。我们在住的楼里也赶修公事，堵塞楼梯，准备迎敌，一直闹到早上四时才睡。当然后来没发生什么大事。

在这前后，造反派喊出“武装保卫成都”的口号。围绕这一口号产生争论，使造反派的分歧表面化，并造成正式分裂。

成都地区的保守派称产业军。当时已撤往郊县。在成都以外的地区，还是

他们的力量大。顾名思义，他们的队伍里产业工人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撤走后，造反派分裂为两派。较持中间立场的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以工科大学成都电讯学院和成都工学院的学生为中坚。他们的主要成分似为学生，但原来保守派的社会基础转而支持他们。

激进派以川大 826 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骨干，简称兵团 826。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只在四川大学居多数，且为其灵魂所在。但他们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他们有市民阶层的背景。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是些什么群体。还有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说，只有卖汤元粉子涝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所说大致不错。也就是说，支持他们的，至少一大部分是没受过或很少受过传统的政治教育的那部分人。他们习惯以常人的立场观察文化大革命。当然产业工人也有如“1119 分团”，川棉战斗师。二月镇反被抓的人则组成《红囚徒》。军队里则以空字 028 部队最坚定。另外还有很多中学生。

后来我了解其他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联筹》也有类似情况。《大联筹》在街上游行时，甚受市民的欢迎并参与其间，乃至万人空巷。北京当时没有全市性的争论，1968 年《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的武斗，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以后的历史事件中，市民阶层充分显示了对政治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与，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已载入史册。

为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离于传统政治生活以外的普通市民卷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区别之一，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也预言了将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至今有人对这些阶层评价甚低。根据我在文革中的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比其他阶层更坏。

成都两派以是否应“武装保卫成都”为斗争焦点，但似乎积怨甚深。红成被兵团 826 称为二老产，在产业军垮台后代替了产业军的位置。我们曾和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的两个人辩论过，他们说，二月抓反革命抓对了，以后还要抓。

这两天是最紧张的。后来就好一点。早在 5 月 7 日，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处问题的决定》，并派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

挺)来组织革筹小组。23日革筹小组在人民南路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中央的决定。还宣布为一些群众组织平反。这之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十七

5月底,我感觉无事可干,又不想回家。这时候重庆风声吃紧,出于一种社会调查的目的,我想到重庆去看看。正好声学所的李锦昌和数学所的张冬冰也想去,我们就结伴乘火车去了。

我们的人以前没去过重庆。我们到了后先找北京红代会的联络站。这里昨天刚打了一仗。楼梯堵得严严实实的,只能侧身通过一条窄路。又经多次盘问,才让进去。但此处无法安排住宿,我们就去一号桥的科委情报所,住在那儿。那儿已有院里造反团的几个人。他们知道我们是红联的,有点紧张。我们则向他们保证不会搞派性。当天下午,他们带我们参加了在体育馆举行的声援成都519事件的群众大会。

重庆和成都不同,保守派彻底垮了。造反派分裂为两派。重大815是一派。他们是很早造反的,今年在重庆夺权成立了“革联会”,受到警司支持,但中央未予承认。对立的一派称砸派,声称要砸革联会,后来因不好听改为反到底派,以西师831、交院915为代表,但军工厂的工人很多。

在这几天里,我们到各单位去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两方面都去。我们一起去过重庆大学、警司、成都826联络站。我个人去过江南岸的交通学院。我们还见过砸派造反军头头黄廉。当时他正在山城影院作到北京汇报的报告。我们还参加了砸派在大田湾体育场的一个大会。当时双方对立已很厉害。在市中心解放碑那里,双方的大喇叭在对喊。

我们的调查提纲如下:1.罗广斌自杀事件。他是在被815派关押期间死的。2.56轮船事件。据说保守派撞翻了这条轮船,死了200多人。3.分歧从何而来?4.警司内是否有一小撮?5.保守派如工纠的动向。6.砸派组织情况。

分歧早就有,如一个12.4事件,但主要分歧是今年的革联会成立和二月镇反。砸派攻击815夺权没大联合,而且是让权,过去的市委干部基本是革联会成员。警司即54军支持革联会,但军分区态度似有不同。二月镇反,革联会上报逮捕1300个,公安局上报为2134个。又红代会不完全调查,三区一县逮捕1700多个,一个区宣布反革命组织十多个。砸派有人说总共逮捕几万人。815

一月份整风曾邀请工纠代表参加，现在保守派一般支持 815。砸派认为警司内有一小撮。

因为我们住在情报所，就顺便了解了他们所的情况。接待我们的是砸派的红色造反团。但我觉得他们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还竭力宣扬他们的对立面是泄私愤，家庭出身不好，“有否定一切的倾向”。根据我的经验，凡是这样说的，都是保守派。

果不其然。我又找他们的对立面联合总部了解情况。联合总部很高兴接待我们，侃侃而谈。我确认联合总部是造反派，红色造反团是保守派。联合总部是老造反，在前一段也受压，被迫解散。但红色造反团这个保守派为什么和砸派这个激进的造反派挂上钩了呢？说来话长。

重庆的文革比北京慢了半拍。当北京的造反派早已得势的时候，重庆还是保守派在掌权。重庆的情报所在业务上受北京的情报所和科委领导。当时在重庆情报所掌权的保守派红色造反团就很自然地 and 科委响当当的造反派张本挂上钩。当然这不妨碍他们在二月镇反中压制反对派并参加了革联会。但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局势变了，中央文革开始支持砸派。红色造反团派往北京的人打来电报叫“速与革联会断绝关系”，于是发表声明与革联会脱离了关系，第二次声明就要砸革联会了。而其对立派就自然而然地倒向本来居于对立方面的 815 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联合总部始终是被动的。我很同情他们。红色造反团显然是政治投机。

重庆的情报所实际是北京的情报所的分所，受北京影响大，所以在重庆可能没典型性。但我也觉得，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派性斗争的成分很大。由重庆情报所的问题引起我对北京情报所运动情况的兴趣，回北京后我又专门到该所了解情况。他们当时还在朝内大街那座漂亮的大楼里。这个所亲张本的掌权一派也叫红色造反团，也许重庆分所是跟他们学的。这个红色造反团原来和非法组织红旗军有联系，所以可能复员军人多。另外我接触时感觉，知识分子好像也多，说话吞吞吐吐，有保守派特征。对立一派叫战委会，工人多，原来和非法组织全红总有联系，实际上他们原来是保守派。我感觉他们像一群流氓无产阶级，说话没谱。总之这个所的情况是很有趣的。

总结几天在重庆的调查结果，我感觉情况挺复杂。对砸派的印象不如 826 好，对 815 的印象也没有红成那样坏。有一些保守派混入了砸派，如情报所。

另外在 56 轮船事件上，砸派的宣传不真实。至于罗广斌自杀事件，也难于下结论。重庆警司支持 815 并不错，因为他们是造反派，但不应压制另一造反派。

近年来，重庆红岩纪念馆展出解放前夕的牺牲者对党中央的意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阶层腐化。这意见书是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所以他本人参加更激进的派别也许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重庆总共待了一个星期，就回了成都。

回成都后，我所来的人已有回去的了。我本没什么事，也想回去。但这时江油“失守”。那儿的保守派反攻回来，杀了很多造反派。恰好我室的王联治探亲到那儿去，失去联络，大家都很着急，我们室里也责成我设法找他。我没有他的联络地址，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成都他姐姐家，碰巧他刚从江油回来。原来他在江油住在保守派老窝里，一点事也没有。但数学所一个姓章的就没这样幸运了。他在江油跟造反派在一起，被保守派捉住打了一顿，在押解途中逃脱，虎口脱险。他们说，江油造反派到北京汇报的三个人中的两个（其中一个叫熊赤兵）被活活打死，第三个是个女的就投降了，“叛变革命”，到处作报告，影响很不好。

这时期在乐山等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也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我经常在大字报上看到，将信将疑。这次听王联治和数学所的这人讲，才信是真的。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武装保卫成都”的口号没什么不对。我回北京后，又听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位著名领导人被对方残害了。

我们在回去前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一期成都版的《红旗评论》。

《红旗评论》是我们红旗联络站的不定期小报，我曾参与做些工作。我们在成都编的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有：社论“武装保卫成都”，这是成都两派争论焦点，我们站在 826 一边。一篇数学所姓章的写的江油事件的报道。一篇成都中和场事件的报道。一篇反对刘西尧的文章。刘西尧跟成都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二月镇反时，我们成都分院的造反派有驻北京代表，被人在刘西尧那儿告了一状，说他们是反动组织，刘就叫他们回成都了。这篇文章是分院一位研究生写的，批判刘西尧的做法。

报纸编好了也搞到了纸，在成都却没处印。听说德阳可以印，我们两个人就带着很重的一令纸到德阳去了。火车上均有 826 派在照顾。德阳在成都北 100 公里处。数学所也有人在那儿，帮助联系的印刷。我们住在重型机械厂的

安装公司，每天到县印刷厂去。德阳的造反派力量很强，特别是这几个大工厂。二月份他们也遭镇压。军队来抓人，架上机枪大炮，造反派还坚持了一天一夜。报纸印好后，主要在成都卖。成都人见是826派的报，买的人很多。

6月底，我们从物理所数学所来的多数人回北京了。成都还留下少数人。

我们回北京后，又有人请红代会的王定之到我所讲了一次“形势报告”。

十八

我们从四川回来后，看到所楼前竖立起一个毛主席塑像。自从这一年的5月清华大学建了第一个毛主席塑像，并得到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就刮起了建塑像之风，从而掀起对毛崇拜的新的新高潮。如果说第一个新高潮应归功于老红卫兵的话，这一新高潮的主体应是造反派。直到下半年毛泽东本人发话，这一建塑像的运动才停止。既然是造反派建塑像，前保守派就在下面嘀咕说没必要。这事我没反对，也不感到什么兴奋，因为那个塑像根本不像毛本人。

我们看到北京市文革的另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高校红卫兵分裂为天派和地派。天派是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地派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东方红公社》，以后还有清华“414”、北大《井冈山》、人大《新人大公社》，另外学院路上属于三司的那些组织，一般都称《东方红公社》，绝大部分在地派。从北师大反叛出一个《造反兵团》，当然加入了天派。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似乎支持地派。

至于天地派分裂的起因，有人说是4月8日的民族宫事件。此事件关系到对统战民委系统运动的看法，当时闹得很厉害。还有人说，是两派对反击“二月逆流”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地派反得似乎更起劲一些，特别是北师大。

这种分裂使我们迷惑不解。我们觉得，两派的分歧似乎不是或不仅是由于对重大问题的观点不同造成的。双方都支持外地造反派。除去民族宫事件外，说不出它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它们之间没什么不同。而对于“老佛爷”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我们毫无好感。因为北大的运动发展不同于其他所有单位，聂元梓这帮人和一般的造反派完全不同，拿我们当时的话来说，不属于同一思潮。那么，蒯大富他们为什么和聂元梓走到一起了呢？所以，我感到，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成分可能起很大作用，或者说，是纯的派

性。地派的人，好像都是老三司的，天派的人，好像都不是。

北京不像成都，没有全市性的重大问题把不同行业的人们分成几派。像《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武斗，谁也说不上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但我们都倾向地派，因为我们佩服三司。我们当然也佩服蒯大富，但对清华《井冈山》的一些极端做法也有保留，觉得他们的层次比地院《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低。我们倾向地派更直接的原因来自我们对北大运动的想法。我们这儿离北大近，北大毕业生多，在北大有同学老师的多，对北大运动了解也多，看法也多，经常到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吃饭时就在饭桌上讨论，甚至争论，当然不像北大那样有火药味。北大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时，我们对聂元梓的看法已与运动初期大不相同。我们看来，聂和陆平可能没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如果聂支持四清，四清也是极左。反陆平当然好，但他们自己跟北大那些干部也没什么区别。

至于聂元梓在文革以后的那些业绩，如到上海去反常溪萍，写大字报反“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都属于奉旨革命，打死老虎之类，为我辈所不齿。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意见，法西斯统治。如搞了个“二组”，专门整学生的材料。这和陆平有什么不同？后来中央文革过问此事，其对立面“团0飘井红”就封了“二组”，导致了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所谓“团0飘井红”指五个组织。团指团派，因为他们的大字报常署名多少团。0读零，指0派，因为他们常署名0几，以区别不同的系。以上两派原来都较松散。飘指红旗飘。井指井冈山。红指什么不记得了。总之这五派，当然还有其他人，于67年夏天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造成和新北大公社对立之势。成立那天，我们到北大贴大字报表示祝贺。

我在北大认识人不少。我的一些朋友都在《井冈山》，而有些我认为不好的人在新北大公社里面。

物理系研究生班的人，除少数党员外，几乎都是《井冈山》。我在校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一位非常耿直的先生，还有一位曾一起工作的实验员，都在其内。我认为他们都是很普通，也是很好的人。

我的一位留校同学参加了新北大公社。他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班干部，但我总觉得他很虚伪。记得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在大饭厅外面，他跟我们说，他在有意识地使自己受苦，例如赤脚走在不平的地上，因为他在锻炼自己准备

受敌人的刑罚。我听了就觉得恶心。我总觉得，如果真发生了这种情况，头一个叛变投敌的就是他。当然这种事没能发生。但文革中，他和新北大公社一帮人去抄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先生的家时，他把饶先生的照相机据为己有。饶先生后被迫害致死。相机到文革后很久才归还。后来还有过一些不光彩的事。

当然不能说所有新北大公社的成员都是这样的人。也有些很好的人出于各种原因参加了这个组织。但两派的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

北大井冈山兵团对知识分子较好，否则也不会有一些大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队伍甚至当领导。原因之一是他们有知识分子的背景，或者说，出身都不太好。一位领导人是研究生。但这些大知识分子似乎没什么良心，过后同样随大流骂《井冈山》。

一般来说，造反派除有市民背景外，还有知识背景。

清华大学的反对派“414”就不同了。他们有干部的背景，他们实际上是“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两个学校的反对派的差别反映了两校原本一些实质性的差别。

我们支持北大井冈山兵团，但和他们没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我们也请过清华“414”的人来讲干部问题。来的也许是谭浩强。我们同意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立场，但总觉得“思想体系”和他们不一样。后来归了国防科委后，还到北航和他们一起开过批判会。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参加这个天地派之争。

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反动路线开始于1967年4月，目的显然是解放一批干部，实现三结合。批判文章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压制干部。这也是实情。

到了1968年，北大两派开始武斗。我们经常去参观，当然离得远远的。他们每派占了几个楼，在楼顶上安装了很大的弹弓，向对方发射石块。一楼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只留少数窗户，架上床板当门进出。有人拿铁棍站岗。据说有人被打死。

最大一次武斗发生在西南门海淀街上。发生原因是新北大公社断了井冈山的电源。井冈山决定从海淀大街上接电。他们预料新北大公社会乘此攻击他们，就作了充分准备。当天当他们接电时，新北大公社果然来了，并抢了一辆32路公共汽车作掩护进攻。井冈山在接线处设了几道防线。第一道是在地上撒了豆子，让新北大进攻者滑倒。第二道是床板构成的防线。在床板后就是手执铁棍的人。当然还有人扔石头。这次井冈山大概是成功了。

我认识的一位物理系研究生是井冈山的，被新北大的抓了去，蒙上眼睛用铁棍打，打断了几根肋骨，住在地质学院的医院。我和北大的同学曾去看他。

新北大公社在这方面是很残酷的。当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人的问题。有个叫樊立勤的学生，因为反聂，被他们以反康生为理由残害得很厉害。

1967年7月份，我们到中关村科大分部参加科大东方红公社一个会。他们的“作战部长”陶荣甲讲话，说北京市周景芳对科学院运动有兴趣。周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属地派。这件事后来受到追究。

在北京，只有中学的运动有全局性的分歧。这就是贯彻中学文革始终的家庭出身问题。他们分为“43派”和“44派”，源于李钟奇和江青的两个讲话。

这期间，一件全市性的事件是所谓围困中南海。我不记得是怎样开始的了。总之是每单位在中南海外面安营扎寨，派人日夜值班，要求刘少奇出来检查。当时是盛夏，这样做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弄的那个地方乱得很。我所也参加了，驻扎地点在府右街分叉的部位。我对这一活动没什么兴趣，没有参与，只是在进城参加什么游行时看到过。后来中央要撤，就撤了。■

【书讯】

甄皓的纪实文学作品

《黑与红——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在美出版

作者介绍

甄皓，1947年生，非常规的平民码字者，75岁前后写下唯一的一本书《黑与红》。年轻时当过工人，科技干部，国际贸易商人，退休后成为背包客游走天下，自号“领过ROC身份证的PRC驴友”。



推荐语

有非常独特的细节，有非常丰满的史实，也有极为生动的故事。语言干净准确有节制，是很好读的一本书。因为它更像一本有着同一主旨的叙事散文集，或长篇散文。这样的方式，读起来更加亲近又轻松。

——小说《迷冬》作者，胡发云

A Personal memoirs with somewhat fiction. Experience and Mental Journey of one Generation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这是一本略带虚构的个人回忆录，它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代人的经历与心路历程。)

——Amazon Kindle Book's Description

(亚马逊电子阅读器对此书的描述)

这是一部真实完整而又令人心酸的私人回忆录，也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深刻历史写照。作者既表达了自己亲身的情感体验和分析思考，也以超强的记忆力，全面地仔细地，几乎无误地叙述了文革中的每个阶段在身边演绎的大小事

件和亲历亲为的故事！全书主线明确，描述生动形象，悲切无奈之余略加调侃和幽默，作为同时代的过来人，不由得随着作者之笔，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一读者

【资料】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刘涛 1967年1月2日的检查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在战斗的六六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到了清华园，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带来了六七年的战斗任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我们的行动。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同学们一方面热情地鼓励我，另一方面严肃地向我指出，绝不能舍后妈、保亲爹。江青同志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限，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逐步认识到，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六七年元旦，我和弟弟刘允真一起去看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前同志，她揭发了刘少奇不少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公布出来，让这些肮脏的东西见见太阳，大家一起来批判它。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

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刘少奇对我们说，“七大”以前没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他是在扯谎，是在诡辩、抵赖。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林彪同志在六〇年就号召全军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居心何在？！”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检查山东、太行山、晋西北等地的工作。一路之上就只讲他自己的什么“党内斗争”啦，什么“战略策略”啦，什么“建立根据地”啦，全是他自己的一套。遵义会议后，全党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在这个时候，还只是突出个人，可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由此可见，刘对毛主席的著作无视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刘少奇一方面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坐在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另一方面，在延安工作时，尽管他去主席那儿只有两分钟的路，但他也不是经常请示主席，对主席并不是忠心耿耿。联想到他在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对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真使人气愤到极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毛主席的修养，借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到处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欺骗党和人民。他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是人民的罪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有个人野心。

一九四一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他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说到：

“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他自夸地说：“领袖来自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这些话暴露了他个人野心有多大。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这句话说的是多么坦白露骨。告诉你，刘少奇，你想要篡党，那是白日做梦，你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刘少奇在很多言行上也是对抗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在他的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在七大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这直接违背毛主席指示。他这个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半无产阶级——贫农。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最后因讨论时大家不同意，才没有写上。然而在五一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用来对抗毛主席，把群众、同志们的批评置之脑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而且在解放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更加错误。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明他是顽固透顶了。

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刘大搞“搬石头，一脚踢开旧干部”，分配土地时，“绝对平均”，这是违背毛主席政策思想的，就是搞的形“左”实右。此事过了十几年，他并不吸取教训，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时，又是形“左”实右。联想起来不是令人深省吗？这两次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纠正了。由此看来，刘少奇民主革命的关也没过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端正了航向，那我们中国就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将要亡党亡国的呀！

从刘少奇以往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刘少奇制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长期以来就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对军队干部就十分疏远，而对白区和他共同工作的干部就分外亲，非常听信于他们搞宗派。从刘少奇到中央后，一直管组织工作，可是他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彭真、饶漱石、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都是他提拔的，而这些人出了问题，可有哪一个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问题，而是刘少奇揭发出来的呢？（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在刘的眼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人，此人就不会有缺点，就可以得到重用；可若是他认为不好的人，此人一辈子就别打算翻身。他根本不是发展地、辩证地看人，他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这样形而上学，主观片面。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照顾他们的困难。”而他对干部漠不关心，对干部的困难不闻不问。毛主席批评这种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谁给刘少奇拍马屁，此人大有希望，若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会大祸临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老子天下第一。（联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不难理解他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他的逻辑。）1941年，在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柳X，顾XX）因给他提意见，他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论党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写的。本来有柳X等人的这一段，后来又删了。他的“论党内斗争”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尤其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凡是对他或他那条反动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者，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扣上“假左派”

“真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达到提高领导或执行错误路线的威信，实现其要求并去吓唬人，这与毛主席正确的党内斗争是直接相违背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直接相对抗的。

刘少奇错误的组织路线，与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离不开的，是与他丑恶的灵魂离不开的，而绝不是像他在检查中所讲的，仅是由于世界观的认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认为，人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1936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锡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他的这套哲学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先烈们大概是“傻子”，而向敌人卑躬屈膝，投降自首才是“聪明人”，这套叛徒哲学并非偶然，这是与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刘的这套哲学，使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很不好受，因此，战争一残酷，他就溜之大吉。1940年，我军打下了盐城、阜宁等地，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后，他就轻敌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他自己住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中学等。违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结果1941年敌人来轰炸，学校散了一大半，人也死了好多，城市最后也丢了。损失不小。日本人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在他逃命哲学的指导下，他弃下军队，赶快跑到安徽，留下陈毅同志在苏北指挥作战。在他这套活命哲学的指导下，他能无限忠于党和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吗？他能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吗？他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试想在中美之战中他能挺住吗？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刘只是一

个“高级”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呀！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只能是唯利是图，在他灵魂深处只能是低级趣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道德的。

现在让我们来揭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画皮。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像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得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

“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

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像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候。还说伺候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做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

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

毛主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限，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刘涛 刘允真

1967.01.02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

注：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9）记述，1967年元旦，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王前，根据王前的谈话，整理成了这张大字报，于1967年1月3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后来辗转传抄，加上各种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很快流传全国。

【资料】

揭发刘少奇

——刘允诺同志1967年1月6日在工人体育场的讲话稿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头号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我要坚决造他的反，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虽然刘少奇是我的爸爸，但是，因为他反毛泽东思想，反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所以我就要和他坚决斗争到底，不斗争就不能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在七机部工作，七机部也和全国各单位一样，受到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毒害。六月初，是文化大革命引入各单位内部以来，七机部的王炳章和投敌自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副部长刘有光（音）一直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了来自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白色恐怖笼罩了七机部，严重地打击和压制了敢革命和造反群众，使七机部群众空前地分裂了。因前“九一五”（又名“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团”）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卵翼下的产物。他们吹捧修正主义分子谭立夫，请工贼时传祥做报告，谩骂革命的安徽“八二七”红卫兵，大闹中南海，捣毁第二司令部等等。这一切罪行就是刘邓路线毒害在七机部的继续。所以今天有必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批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还不知道压制群众革命，包庇领导过关的根子就在刘少奇。所以，当时我还把七机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讲给他听。六月初，我们单位里有人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写了一个标语牌，其中有一句话：“打倒资产阶级保皇党”，标语牌一出来就遭到了围攻。当时院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毛华山（音）亲自出马，称标语牌是反党动员令，是大黑话，大毒草。这个情况我在6月23日与他谈时，他却声称：这是有所指的嘛，否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出这样的标语呢？有人动机不纯，有人要想夺取政权。他还说，黑板报标语

是煽动，你们那里揪不出牛鬼蛇神？一个也没有？会有的。他对群众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他就是念念不忘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在群众种抓牛鬼蛇神。当我谈到我怀疑有没有人背后操纵时，他露骨地说：反击大字报可能是党委写的。反革命故意用左的面孔出现，要分清左、中、右。他就是这样不相信群众，鼓吹他那套反毛泽东思想的逻辑。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七机部各院出现了引蛇出洞之说。应当说，这个话来源于刘少奇。1965年1月刘少奇就和刘涛说过：蛇要出来才好打，冒出头来，冒出一半来打不倒，要等全部冒出来。这不是引蛇出洞的指导思想吗？七机部刚刚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苗子，被顽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部院领导，用压和拖打了下去。可刘少奇却说：党委不急于表态不一定错，你们不要说党委是黑帮，他不是黑帮，你说他是，他就不舒服，这不是十足的保领导吗？不也正为保他自己打基础吗？当我谈到院党委针对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做出了保护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毛华山，保住假技术权威图 XX 不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定时，我说，我坚决反对这个决定，并且到几个食堂去宣讲，要把七机这个多年来政治上的一潭死水搅浑。打开这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原子弹也炸不开的堡垒。从而引起了对我有组织的围攻。这时刘少奇拿出似乎对我关心的样子说：你要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主动检查，免得人家来揪你，你有个人私心杂念，有错误就改嘛！可是后来我并没有检讨。因为，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我觉得，我抵制院党委的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我就是造这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反，而且要一反到底。当时在单位里我受到围攻，在家里也受到孤立。但是在我心中有着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所以我就永远不孤立，我要永远造反。

九月份七机部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里程，针对王炳章和叛徒刘有光对革命群众的压制，我参与了去中央接待站要部院领导交出黑材料的革命行动。之后那些尾随当权派的保守势力“九一五”捍卫团的头头们就大骂我制造混乱，要我去劳动改造。竟把这样的传单，附上一封信寄给他们的黑司令刘少奇，要刘少奇来管教管教我。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已经扭转了错误路线，刘少奇已经受到批判，他无法再为非作歹了。

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深入人心。原来属于保守派的刘涛也起来造老子的反了。这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但是制定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

是不甘心他的失败的。早在八月初，他就对王光美讲：以后不要找涛涛（指刘涛）联系，涛涛不可靠，以后要出卖我们的。由此可见，他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就是不甘心承认错误，不向伟大的毛主席，不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低头认罪的。在后来，他敷衍的检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的。在这里正告刘少奇，你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你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是有历史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制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这个照妖镜来仔细分析他对我们的许多言谈，就可以看出他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

他惯于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刘少奇自己都说过：许多事都是我刘少奇干的，而出名都是毛泽东（这是大意）。而王光美却以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吹捧刘少奇，这实质上是刘本人的政治野心自我暴露。而他却为自己辩解说：七大时，有人不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因此我要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就用不着提了。事实上他总是找许多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反对毛泽东思想，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我曾向他谈过，要用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来要求自己，他却不让我这么提。他说，你这么提呀，会使人家误会你是想接毛主席的班，这是何等荒谬的言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又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在这里毛主席的阶级何阶级斗争观点是多么鲜明呀！可是刘少奇抹杀阶级斗争，反对对人做阶级分析。他跟我们谈话只笼统地把人分为好人坏人，他要我们对不好的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他说涛涛有时和好人关系搞不好，但坏人也分不清楚。他把激烈的阶级斗争现象归结为一个时期坏人取得中间群众，好人被孤立。按照他这个逻辑，入团入党是决定自己做个好人还是坏人。而党员、团员中多数是好的，是可以“感动”的，注意感动两字。这不是完全否认了在我们头脑里的阶级斗争吗？他不分敌我，笼统地说，

好人总是有坏人反对的，坏人不反对，反倒是有问题的。这和毛主席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岂不是作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吗？而作为一个好人是要别人不刻苦，你刻苦，这一比较就会是好的。这里那里还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息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就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主席又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可是刘少奇却一贯不相信群众，长期当官做老爷，我们从机关回去反映一些情况，他根本就不听。1963年初我们机关的同志，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关心，要我回家反映领导上搞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的严重问题。由于他根本不听，我没办法，只好让机关的同志直接去谈。当时几个同志抱着很大的希望前来反映群众意见，刘却派王光美出来接待。过后刘少奇跟我说：这些人要踢开老专家，他们自己当专家。

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六月份，他还警告我，要我提防这些人，这些人有野心，要当专家。刘少奇一贯就是这样看待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的，难怪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成了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可是对王光美这颗糖衣炮弹却言听计从。例如在四清运动中，听了王光美的话，他就提出四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听王光美说要踢开绊脚石，就压制称伯达同志提出的要撤工作组的意见。这除了证明他们气味相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指向毛泽东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且也提出必须按照五条标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刘少奇却用一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修正主义人生哲学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妄图把青年引入歧途，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他常跟我们说：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会吃亏，但最后不会吃亏。不怕吃亏，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大家，长期这样坚持下去，不要为一时的挫折所动摇，这样经过一时期就可能入团，再经长时期努力就可以入党。只要你们自己好，人民就会拥护。不管做什么，当农民也一样。干得好，工作能力强，就会当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社长，这不用自己爬，自己只要好好干，别人就会选举你。舍得吃亏，就会得到信

任。要能上能下，下了还是要上的。下连当兵将来会当连长、营长、团长，生活也会好。他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和我现在当上了主席来证明他的你去追求的东西不一定能得到，你不追求的反倒能得到的谬论。他所宣扬的除了靠个人奋斗，为入党入团。升官发财、追求名利、地位生活好以外还有什么呢？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又是什么呢

这不是深刻暴露了刘少奇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吗？他这一套不正是在制造修正主义的土壤，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吗？他要求我们在细节上谨小慎微，做个正人君子，可在政治上，却不谈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他要把我们培养成他那样的人。我虽然从苏联学习回来了，受到一些修正主义影响，思想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但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自觉不自觉对他是有抵制的。因而我在家里就成了一个叛逆。过去，我不敢公开反对，因为他是党的化身，谁要反对他就是反党。

在家里，刘少奇把我当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我的弟弟、妹妹。他跟刘涛说过：你到底是走毛毛（是指我）的道路呢？还是走 XX 的道路呢？毛毛不懂这些道理，根本方向错了。甚至为王光美召集所谓家庭会议，组织弟弟、妹妹对我进行围攻。我表示我不会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我对错误观点我不隐瞒，但爸爸说的那一套我做不到。王光美威胁我：“你反对爸爸，是反对爸爸的缺点吗？是反党！”可见用反党这顶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是由来已久的了。

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方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63年春，我就要求下农村劳动。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我没有这个思想水平去农村劳动，因而剥夺了我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权利。64年我有机会下连当兵，在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园里，我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提高。当兵一年，二次受奖，评上了五好战士，还入了党。我回来后曾向刘少奇讲：在连队我想的就是如何多做好事，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星期天也能做好事。可是一回到北京，星期天听到的尽是看电影、游泳等。在这种环境下下放锻炼的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刘少奇的话简直不能容忍。他说：有些人在困难情况下变好，如毛毛。溥仪坐班房才好的。他竟然把我在连队锻炼的收获和大汉奸满洲国皇帝溥仪坐班房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下放锻炼制度的侮辱，对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连队的诽谤。一句

话，他就是在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正是按照他那一套资产阶级人生哲学来对人处世的。他在表面是正人君子，骨子里见不得人。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这是地地道道的活命哲学。他指示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用自首书的方法出狱，这是鲜明例证。而早在白区工作时，就贪污党的经费和党员的党费来打金皮带、金圆和金鞋拔，更是他资产阶级人生观、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典型表现。可见刘少奇这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高级个人主义者的灵魂深处是多么肮脏。

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无论刘少奇怎样打扮，软硬兼施，他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嘴脸终于在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了。为了挽救他，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做了许多揭发和批判。但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迄今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避重就轻的检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七机部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普遍感到腰杆子挺起来了。这就是因为炮制反动路线的头号罪魁祸首刘少奇也不过做那个不像样子的检查。他们想，他们更可以通过了。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刘少奇不说话，王光美却沉不住气了。她说爸爸的检查主席有批示，说检查不错，尤其是后半部分。王光美想以此来堵我的嘴。老实告诉你，这办不到！

刘少奇现在很少讲话，但他的想法往往通过王光美的嘴流露出来。比如师大一附中把刘平平的本子抄走了，公布出来，王光美要刘平平把大字报抄回来，并且说：他们歪曲，你也可以歪曲在什么地方（原文如此——编者）。还说是断章取义。为什么不全文公布，有对的地方嘛！我们向刘少奇提的意见，王光美却一点一点给解释掉了。在王光美嘴里，似乎刘少奇没有什么错误。而刘少奇却以默许的态度表示和王光美一样，仍然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我以“九一六”革命造反兵团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在这里严正指出：刘少奇你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反动人民、镇压人民。而且由你抛出的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流毒全国，浸渗到各个角落。你已经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坚决要求你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立即向毛泽东思想这条战无不胜的真理无条件投降。如果你再执

迷不悟，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刘少奇是我的父亲，但今天他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我就要坚决起来造他的反，和他斗争到底！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最后让我们高呼：

彻底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反对路线！

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万岁！🇨🇳

【读者来信】

1. 越人纠错

《记忆》324期中《文革权力之争的整体框架》一文有两处叙述不太准确，一是文中引用《林彪日记》的内容，但此所谓《林彪日记》为网上伪文，非常相似的文字在网上数度出现过，只是名字改成了《周恩来日记》、《杨尚昆日记》等，由此可见其伪。根据现有史料，林彪并无写日记的习惯，但他喜欢读书，爱做笔记，913事件后，林的毛家湾住所被查抄，从中发现了林彪、叶群留下的不少笔记，之后有整理，以《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之名内部印行。早些年林彪秘书李德与舒云合编林彪年谱，以《林彪日记》之名出版，但此书与网上所谓的林彪日记毫无关系，该书中也没有网上所传林彪日记的任何内容。

二是文中叙述七千人大会后的权力格局称康生当时执掌秘密警察系统，此说不确，王珺的《康生在中央社会部》一文（《百年潮》2003年第5期）指

出，康生在40年代后半期离开了中央社会部（该部后改名为中央调查部），之后很长时间并不管中调部（中调部）的事务，他因此在文革中抱怨，中调部的事“长期不让我与闻”，“我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康生重新掌握中调部大权是在文革中，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的由林彪主持的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他在此次会后把分管的中央调查部的工作等移交给康生（此前的1966年6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为邓管中调部，陶铸管中办、中宣和中组部，康生管中联部和中央党校，见邓小平年谱2020年版《第四卷》第583-584、596页）。一点谬见，仅供参考。☞

2. 霜红有问

文革的基本思路是一斗二批三改。批什么呢？“五七指示”说，学生、工农、知识分子在兼学别样的同时，都要批判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什么呢？“十六条”说，“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怎么批呢？《人民日报》的社论回答：“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年8月25日）

请教各位老师：

- 一，中央文件里有没有关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解释或定义？
- 二，什么叫大批判？大批判与批判有什么区别？
- 三，大批判为批判开辟道路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期待您们的指教。☞

3. 朱小棣谈父母的往事

贵刊325期谢阳秋的文章《毛林密谋》写得真好。读后引发一点个人记忆：

我父亲朱启銮是1965年11月去苏州上任的，现存官方记录1965.12-1966.5苏州市第六届人民委员会时期的第一副市长。我和我姐都听他说过在任期内分别接待过林彪和贺子珍，可是他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详情。他当时暂住

苏州南林饭店，晚上经常去书场听评弹解闷，可是我记不清他是否见过陈云或陪他听过评弹。后来文革中写检查时我见过母亲说自己觉悟低当年竟然认为刘少奇的“黑修养”水平如何之高。她是口述让我姐代笔的。她那时真是觉得刘水平高，但我父亲好像不太以为然，至少他把毛选当作更珍贵的书籍作为礼物送人，而不是“黑修养”。也许正好从侧面证明《修养》印数太多，大大超过毛选。

期盼《记忆》杂志越办越好。祝一切顺利！🍷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

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